

第3期
西語系系刊

OLÉ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UNIVERSIDAD TAMKANG



2011年4月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出版

前言

吳寬 主任

系刊 *OLÉ* 2011 年採訪稿一方面呈現本系之過去，專訪兩位老主任，陳雅鴻老師及熊建成老師，也採訪傑出系友，例如具外交歷練之系友、長居國外之系友俾使學子對於未來生涯規劃及國際化有所體認。此外，也向林盛彬老師及羅幕斯老師（José Ramos）邀稿，並附上數篇學生之中西文習作。其中包含三團去年夏天參加青年大使的同學拉丁美洲見聞。

此次的編輯還要感謝白士清老師提供學生習作以及林盛彬老師提供寶貴意見，還有碩士班一年級 Anita 蕭玗琦同學自願閒暇之於幫忙採訪、撰稿及美編。若有不週之處，請大家海涵。

Palabras preliminares

Ana Wu

Otra vez sale a luz el **OLÉ** de 2011. Como siempre el enfoque se vincula con el pasado, el presente y el futuro del departamento. Mediante las entrevistas, tanto de los dos antiguos directores como de los antiguos alumnos, se vislumbran los esfuerzos y la perseverancia de ellos que nos sirven como modelo.

La sección de los escritos de los estudiantes refleja en cierta medida el fruto de la enseñanza del departamento. Quisiera agradecer a los profesores, Abel Lin, José Miguel Blanco y José Ramos, que nos ofrecen artículos para agregar un toque académico a **OLÉ**. A la editora Anita Hsiao le debo la gratitud por echar una mano voluntariamente en su tiempo de ocio.

目錄

訪問篇

歷屆系主任：陳雅鴻教授	P4
熊建成教授	P9
系友專訪：國貿局陳銘師副局長	P13
孫大成大使	P15
李靜枝老師	P17
馮竹美學姊	P19
匿名學長	P20

系友分享篇

葡萄牙共和國建國百年話滄桑	P22
---------------	-----

師生分享篇

教師分享：	
Elogio de la lectura	P27
Formosa, 我愛你	P29
給我種子，我就給果實——安赫拉，費葛拉	P32
碩士班習作：	
《愛情是狗娘》電影中「狗」的象徵意涵	P34
巴拿馬見聞	P39
真心付出的交流，熱切參與的回應	P43
尼加拉瓜見聞	P45
新聞翻譯：Ministros de Finanzas de Américas divergen sobre impacto de los flujos de capital	P47
大學部習作：	
No hay fronteras para el amor	P52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P53
La solidaridad como muestra de amor	P54
Problemas actuales de la sociedad taiwanesa	P55
¿Cómo mejorarías la calidad de vida de los taiwaneses?	P56
Cuenca 遊學心得	P57
遊學新發現街頭藝術	P59

附錄

P61

訪問篇



La entrevista

訪問歷屆系主任 - 陳雅鴻榮譽教授

碩一 Anita 蕭玗琦

2010/12/24

老師擔任過校長、學務長、文學院院長、西語系主任等，是位資深的老師，教過的學生所計無數，請老師談談在當系主任時期的經驗談：

民國60年回到淡江教書，民國60年8月1日(1971年)擔任西班牙文系系主任，當了6~7年。當時西班牙文在台灣算是冷門的科目，很少人學。當時是以全國聯招的方式來招學生，一個班級只有60個人。學生不是按照志願就讀的，進來西班牙文系以後總覺得怪怪的，心中充滿疑問：念西文要幹什麼呢？家裡父母親也覺得念西班牙文沒有什麼出路，要怎麼辦呢？也間接影響了同學念西班牙文的興趣和信心。

當時的環境是這樣子的，和世界的關係比較沒有那麼密切，比較封閉，看不出學西班牙文有什麼好處。但是我們淡江大學辦學是前瞻性的，就是用未來學的觀念看到了台灣是海島，須要向外發展，各種語言工具都很需要。

拉丁美洲這塊區域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在國際關係之下，一定有它發展的餘地，因此和台灣的關係我們應該要建立起來，對台灣將來的發展有所幫助。

我當系主任時注意到同學念西班牙文的情緒很低落，沒有什麼興趣。主要我分析出下列幾點：

1. 念西班牙文抓不到將來的方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2. 將來畢業以後找工作怎麼找？

主要是實際的將來找工作和方向問題，我覺得有需要從這個角度著手來向同學們解釋：

不管是新生或是舊生，念西班牙文是有它的將來性的。也就是說我們對外發展，除了我們大家必須要學的英文以外，第二外文也是很重要的。將來變成工作競爭的工具，所以念西班牙文系是有它的出路的。我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著手，幫助同學找出路。在當時很不容易，我向同學們分析西班牙文系畢業後有幾條路可以走：

假如你喜歡當公務員的話，那麼有公家的考試，國家考試、高等考試、外交特考都有考西班牙文。你可



以準備國家的考試，外交官也好，高等考試也好，一般的公務員考試也有考西班牙文，這是一條路。

假如你要做學術研究，你也可以準備出國到西班牙、拉丁美洲、甚至於美國。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很多大學都有西班牙文系，所以假如你想做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那你可以準備留學。

第一條路：參加國家考試。

第二條路：出國留學，當教授，當研究員。

第三條路：實際留在台灣工作，也有出路。因為台灣從事國際貿易越來越發達，那麼從事國際貿易的大公司要和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做貿易一定需要西班牙文。為什麼呢？因為在拉丁美洲很少人講英文，他們都是講自己的語言西班牙文，所以你要和拉丁美洲做貿易你一定要講西班牙文，跟他們作生意或是跟他們有什麼關係一定要講西班牙文，西班牙也是一樣的情況。所以你留在台灣工作假如你有西班牙文為工具，除了英文以外你還懂西班牙文，這是一個很好的競爭資本。

我在同學們6月將要畢業以前寫了很多信到台灣各大企業公司去大力推薦我的學生，說我們有學生即將要畢業，假如你們需要西班牙文人才的話直接和我們聯繫。我們會推薦好的同學到你們公司去工作，結果很好，在我主動以系主任的名義推薦同學出去之後，他們得到了不少工作機會。

除了上面所講的出路以外，如果你想要將來從事於文學、藝術工作也很好。每個人都有它的才華，就看你的興趣在哪？讀了西班牙文之後你可以欣賞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的著作，有很多文學作品得到了諾貝爾獎。

你要做翻譯也很好，多學一個語文能開展你的視野。當做一個工具也很好，人家不懂的你懂。做翻譯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工作。所有這幾條路我都跟同學講的很清楚，讓同學有一個方向，了解念西班牙文有這幾條路可以走，不是沒路可走的。如此一來同學開始有了信心。

聯招進來是一個班60個人，我剛當系主任的時候很慘，為什麼呢？系上原本60個人，畢業時剩下20~30個人，大部份的人是轉系，因為他們覺得念西班牙文沒有用。有的人是成績不好不能畢業，剩20~30個人，我都覺得西班牙文系很難辦下去，所以我想辦法鼓勵同學們提起他們的信心，讓他們心中有一個方向。接下來就是加強西班牙文的教學。以前他們念西班牙文是有點散漫，不太專心，所以我想加強他們的信心。

教學方面加強聘請好的老師，當時很難聘請，因為找西班牙文的老師很難找。我從教會裡面請神父修女來教，讓同學能夠實際的對語言學習方面多了一條道路。加強師資、提高同學們的信心、增加他們的興趣，這些都非常重要。

我在西班牙文系主任時期常常辦一些和西班牙文有關的活動，像是西語系的畢業公演。現在又恢復了，以前有好幾年都沒有辦了，多虧吳寬主任又讓畢業公演繼續辦，這是非常好的活動。畢業公演用西班牙文來演戲，可以提高同學們的興趣，比辦任何活動都有幫助。能夠把系動起來！所以西班牙文系變得很活潑，當然我投入很多的時間精神和心思。當時我每一個同學的名字都可以叫出來，現在就沒辦法了，時間久了學生太多了。早期民國六十年代我每一個同學名字都可以叫得出來。連家裡情況都很清楚，和同學相處很頻繁很密切，就像一個家長。系上的氣氛非常融洽，充滿活潑的精神。這個系算是我這樣把它帶上來，沒有經過一兩年，這個系就改觀了，變成一個非常活潑有表現的系。最主要的是我們關心同學，教育本來就是愛的工作，是愛的事業。愛同學們、照顧同學們、指導他們、引導他們有什麼方向可以走。我要鼓勵同學們念西班牙語文學系是很好的，西班牙語碩士班，拉研所也一樣，每年都有同學考上外交特考，出國留學的也很多。

後來我當上校長，我和Navarra大學簽訂姐妹校。Navarra 大學的校長到我們淡江來，我和他簽了備忘錄，然後我又到Navarra大學正式簽合約，作姊妹校學術交流。這一段經驗我覺得非常寶貴，當系主任的這些日子把這個系帶上來。

後來我又擔任了學務長，在那段時期台灣的社會比較不穩定，台灣民主化的那一段日子，首要任務是如何把學校安定下來？

接下來當校長，學校行政方面幾個重要職務我都做過，教育行政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經驗可以放在教學方面，這都非常有幫助的。而教學方面我是非常投入的，教西班牙文是我的本行。

我在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法學院從一年級開始念。我去西班牙以前是念我們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在我們英專當然是念英文。我到西班牙去改念法律。從一年級一直念到國家博士，做研究，前後有15年，我對西班牙是非常的熟悉。專長方面，因為我是念法學，社會科學，之後再念國際法。這樣一來我在拉研所開課，同學們做拉丁美洲研究，我上課的內容著重於國際法的辭彙(vocabulario)各方面的解釋。也有很多我們拉研所同學考上外交特考，他們都覺得受益良多。聽過我的課，對國際法的詞彙增加了解，我覺得很高興。現在在外交部中南美洲司，此單位是管拉丁美洲這塊區域的，可以說被我們淡江大學西班牙文系和拉丁美洲研究所攻陷了，百分之80~90都是我們的學生。西班牙文系、拉丁美洲研究

所、歐洲研究所，大部份的學生都上過我的課，所以感到非常親切，拉丁美洲這塊區域是我們外交邦交重要的一個區域。

很多之前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大使、一等秘書、司長等在外交部中南美洲司工作。所以我覺得我們對國家有盡我們的能力，幫國家拓展外交，這是我們的成就。西班牙文系、拉丁美洲研究所、西班牙文碩士班及歐洲研究所，我們覺得對國家是有貢獻的，不是誇大其辭。

問與答：

問：民國60年代的學生對西班牙文不是真的有興趣，是用聯招進來的，而現在是學生是自己填志願進來的，您會不會覺得學生學習的成效是一直下降？

答：社會型態有所改變，年輕一代不可否認不像早期60年代的學生真正用功的學生就很投入，比較踏實一點。現在年輕一代受電視的影響，當然好的學生很多，有部分的同學比較不踏實一點。

問：在老師教文法課時有沒有想要提出來的事情？

答：只要他們扎實的去念，文法是很重要的基礎。實際的去了解，才能夠真正的進入西班牙文的境界。所以文法沒有念好就沒辦法再提升西班牙文，希望他們上這門課能夠很投入扎實，基礎一定要打好。有些同學是不太認真，這每年都會有，一般來講認真的同學還是佔多數。

問：老師在西班牙待過15年，如果同學想要創造環境要如何接觸很多外國人？

答：時代不一樣，現在遊學是一種風氣，展開視野。Navarra大學同學也可以去一年，這是非常好的訓練。我們希望同學們踏實的去念，一定會有成就。尤其現在和以前不一樣，機會又更多了。60年代我開出來的是「開始」，展開那扇門。現在門都已經展開了，現在念西班牙文是很有出路的。西班牙文是聯合國五個工作語言之一，在聯合國發表演講可以用西班牙文。拉丁美洲那麼廣大的一片土地，有非常多的人民講西班牙文。而在美國西班牙文是第一外文，至少有百分之十的人口講西班牙文。因為拉丁美洲的移民很多。美國現在有三億人口，那麼講西班牙文的人口就有三千萬人。西班牙文現在變成一個除了英文之外很通用的一個語言。所以念西班牙文是很有出路的，很有用的。假如用不到也很好，你可以欣賞文學作品，提升自己的生活層次。人不是只有每天吃飯睡覺而已，你還要有精神生活。尤其我們知識份子，能夠有西班牙文這個工具來閱讀西班牙文著作，提昇你的層次，你的文化水準，這些都是享受。念西班牙文是很有價值的。

問：有老師在課堂上提到要練習中文翻西文就要先從翻譯法律做起？

答：要有中文法律的基礎概念，先了解法律詞彙意義，還有本身的語言就要好，才能翻譯到到另一個語言。

問：在拉美所上課的心得？

答：拉美所同學很不錯，進來研究所的同學都不錯，為什麼呢？有心向學當然會進研究所，有心唸書、好學、方向也都抓的很準。比如說考外交特考，國家考試或是繼續深造，或將來準備走學術路線都很好。

在老師慢條斯理，富有邏輯的介紹他的教學歷程時，親切的態度，把我的緊張的情緒都丟到千里之外了。這半小時就像是聽了一場演講，滔滔不絕，令人叫好！也像是看了一幅畫，讓我們回到30年前的光景，也看出從前對於現在的深厚影響。老師開拓疆土，我們歡喜豐收。我們要不忘飲水思源，好好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老師也鼓勵我們，讓我們知道讀西班牙文不是沒有用處的。它是一個語言，一個工具，更是讓你迎向光明未來的籌碼。各位，共勉之。

訪問歷屆系主任 - 熊建成榮譽教授

碩一 Anita 蕭玗琦

2011/01/12

在我大二時，我的文法老師就是熊建成教授，這次訪談感到特別親切。平常上課時老師比較嚴肅，但是在路上遇到老師時總是會和藹地向我們打招呼。在2011年1月12號，一個溫暖的冬日，到了老師堆滿藏書的研究室，採訪老師的教學與行政經驗談。

經歷：

熊建成教授畢業於馬德里大學獲文哲學國家博士，擔任過本校國際研究學院院長，1994學年度兼任大陸研究所所長。曾出國開國際會議65次，走遍全球65國家。



1971~1973年：回國前，擔任馬德里大學曉星書院院長

1969~1975年：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哲學院助理教授

1972年：當選為海外十大傑出青年

1973年：代表西班牙學術界，應邀回國參加「第三屆國建會」

1973年：榮獲西班牙政府頒發智者Alfonso X El Sabio文化勳章

1980年：在系主任任內奉教育部令率領「中華民國綜藝團」赴拉丁美洲11國友好訪問三個月；教育部頒發獎狀

1984~1987年：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訪問教授

1985~1986年：中美洲哥斯大黎加大學客座教授

1989~1992年：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

教授西文翻譯、歷史地理、文學、商業書信、文法、拉美政治、經濟及拉美當代史

1993年：「中華民國學者拉丁美洲友好訪問團」成員，訪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及智利等四國。

熊教授透露：淡江大學西語系「歐洲進修旅遊團」是在我任內推動的。我們這個西文進修團是中華民國第一次創舉，重點發展是創造機會加強學生西語訓練。

1982年開始推動到歐洲進修旅遊團。為什麼叫進修呢？為加強學生西語之聽、說、寫之能力，本校西語系特與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哲學院合作，組成暑期研習團，赴馬大為期四週實地密集課程訓練。早上八點上課到下午兩點，下午有很多活動，四個星期課程結束，我們開始旅遊西班牙各大城市：Barcelona，Valencia，Granada，Sevilla和Málaga。之後我們旅遊歐洲其他國家，在西班牙28天，歐洲其他國家23天。在逛完西班牙之後，我們到羅馬，義大利佛羅倫斯和威尼斯，然後穿過庇里牛斯山，到維也納，奧地利，匈牙利，瑞士，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和英國。這條路上從義大利之後這幾個國家我們坐遊覽車。然後在倫敦乘坐飛機飛曼谷，到曼谷及Bataya旅遊觀光。然後再到新加坡，香港停留後再飛回台北，很豐富的行程，很可惜現在沒有舉辦。1982~1994一共舉辦了10幾年，我是導遊也是領隊省掉了導遊費用所以很省錢。亦為今天的「大三出國」打下基礎。說到這裡，提到國際化：西語系在國際化方面推動很成功。不久法文系、德文系也就跟上來。輔仁大學和靜宜大學西語系接下來也推動起來。

熊教授大事年表：

1978~1989年：擔任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系主任

1982~1994年：推動「歐洲語文暑期進修旅遊團」

1983年：主任任內，選派西語系三學生到智利天主教大學修碩士學位。現在有一位在教育部任職。

1984年：本校和哥斯大黎加大學締結姐妹校。在主任任內選派了四個交換學生去修碩士學位。現在他們都學成返國，大部分擔任公職，在國際文教處工作。在熊老師任內的畢業學生，很多在政府部門擔任公職，工商界當老闆，大專院校任教。尤其在外交部、經濟部及教育部，擔任大使、代表、參伺、司長等職位。

1988年：促成與西班牙Navarra大學締結姊妹校。現在每年有「大三出國」前往該校。Navarra大學培養了不少我們國內師資，目前系上張茂椿老師、何萬儀老師、劉愛玲老師、劉坤原老師、白士清老師和李靜枝老師等均是。

1989年：在西語系主任任內創立了全國第一所拉丁美洲研究所

1989年：系主任任內，舉辦了中華民國第一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會議

1992年：促成與墨西哥自治大學締結姊妹校。現在拉研所每年均選派三位學生前往研習一學年。

1994年：首屆「大三出國」（接歐洲進修團計畫之後）

1995~1997年：院長任內，擔任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國際研究協會主席（會址：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

1996年：院長任內在淡江創立台灣第一所東南亞研究所

1997年1月5日，擔任在智利TALCA大學召開第八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國際研究協會學術研討會大會主席，主持開幕式。

2006年： 倡議及推動本校西語系成立西班牙文翻譯碩士班

問與答：

問： 文法課同學如果比較跟不上老師的建議是？

答： 大一如果沒有好好念很可惜，一升上二年級，也許我這個老師要求比較嚴格一點。我們從這裡講起，我當系主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嚴格考核、加強淘汰」。透過這個方式，要學生們用功唸書。我們那時訂有淘汰的比率，一個班級要淘汰多少人？不能低於多少？所謂「嚴師出高徒」，提升學生文法能力。

現在時代不同了，許多同學一進來有個錯誤的想法，「我在高中念那麼多年太辛苦了，大一就給他輕鬆一年」。所以第一年就沒有打好基礎，第二年上我的文法課就會很吃力，我請同學們上台回答問題，不是單單講出答案，而且要解釋為什麼會有這個答案。回答問題常要經過三個“¿Por qué? 階段”

我強烈呼籲，進來的一年級學生要好好用功。同學們不要相信我一年級玩他一年，二年級再看就好。一二年級功課很多，一年級基礎沒打好接下來就會很辛苦。因為你到淡江大學來是求知識，不是來玩的，是來念書的，四年時光很快就過去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提升競爭力！

問： 西班牙文對於拉研所的重要性？

答： 西班牙文是一個寫論文時的學習與工具，因西班牙文是撰寫有關拉美項目的第一手資料，更具真實性。

問： 老師教拉研所課程有政治，社會，經濟方面

答： 拉美所是區域研究，有四個面向： 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
課程設計著重培養拉美專業與實務人才。

問： 您帶團過幾次？

答： 9~10次

問： 最近一次是幾年？

答： 1992年6月，正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週年紀念。也是我本人最後一次帶領「歐洲語文暑期進修旅遊團」，前往西班牙進修西文並參訪在Sevilla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和在Barcelona舉行奧林匹克運動大會。

問：大三出國的前身是？

答：「大三出國」前身可說是「歐洲進修旅遊團」。暑期赴西班牙馬德里大學為期四週密集課程訓練，並親身體驗歐洲各國之民情風俗。

編輯感言：

在熊教授巨細靡遺的介紹他的經驗歷程，好像看了一場電影，像是旅遊片：在欣賞的途中，它可以帶領你到你嚮往的地方；像是紀錄片，告訴你一個成功的人物從過去到現在的一切；像是冒險片，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主角，征服全世界。

成功不是偶然，熊教授鼓勵我們，要認真唸書。嚴格或許會有些反彈，但是出發點都是為了同學好。讀西班牙語在現在是一個很有用的事，希望各位同學在看完這篇文章後，收起心，進入西班牙文的世界，進而像熊教授一樣，從西班牙看世界。

訪問傑出系友 - 國貿局陳副局長銘師

碩一 Anita 蕭玗琦

2011/01/12

2011年1月12日，我和陳國貿局副局長在電話中進行訪問。親切溫和的語氣，令人感到安心。從訪問中我們可以看到學長在求學期間的用心，對未來規劃的遠見，一路平順也見證了勤學的重要性。

淡江求學歷程：

陳副局長1972~1976年就讀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從桃園上來台北唸書，因為住校，同學們感情都很好。當時黃輝達教授教大一西語文法課，教學非常認真，下課後都會很有耐心地留下來解答同學們各項疑惑或不清楚的地方，大二文法則是由西班牙留學回國之陳雅鴻博士授課，陳博士當時亦擔任西語系系主任，為了增加同學們學習西語機會，陳教授上課全程用西班牙語教學，讓他印象很深刻，收穫也非常多。

陳副局長感謝張創辦人建邦率先在淡江推行輔系制度，讓同學們有機會選修其他科系作為輔系，當時他輔修國際貿易系，除利用夜間上課外，暑假期間並得到台北城區部上輔系相關課程，因此，四年即把所有本系及輔系課程全部修完。大學四年級時，很幸運認識他的夫人，也是校友，當時是歷史系學生。學長透露他因為多修習了輔系，課業繁忙，幾乎每天都到圖書館讀書，為了賺點生活費，也曾在語練教室工讀過。1976年~1978年：服兵役

編輯感想：這對於現在的學生來說也許很困難，但是就是這樣驚人的毅力，使他導向成功之路！

工作經歷和生涯規劃：

第一份工作是在外銷鞋廠，老闆派他到薩爾瓦多工作一年。在工作中使用西班牙文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之後回台轉到從事縫衣機、電扇外銷的貿易公司，在那個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出口暢旺，必須到美國及中南美洲接洽生意，接了很多訂單。

1980年考上經濟部駐外商務人員特考，1981年正式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上班，1982年外派哥倫比亞，之後曾外派烏拉圭、巴拿馬、義大利米蘭、巴拿馬(第二次)及西班牙等國家。

在第一次外派巴拿馬期間，利用晚上及週末，至國立巴拿馬大學國貿研究所進修並取得學位。

2004 至 2010 年外派西班牙期間，在同仁一起努力之下，西班牙與我國雙邊經貿關係大幅提升，進出口貿易總額亦自 15 億美元提升至超過 23 億美元。在西班牙期間曾六度與淡江校友會前往 Navarra 大學探訪母校大三交換學生，並擔任兩年淡江校友會會長，2010 年 10 月調回國內擔任國際貿易局副局長職務。

給學弟妹的建議：

學習外語要有勇氣，多講，遇到外國人，給予適時協助。如有訪問團，可爭取參與並藉此機會練習西語。現在淡江有中南美洲籍學生，同學應該要鼓起勇氣，多找機會與他們聊天，可以獲得很大的進步。學弟妹們要學以致用，當然英文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要到外貿公司上班，可在大二、大三期間到私人企業打工，雖然薪水微薄，但可以學習到寶貴的工作經驗。上課要認真，多寫，不會的問老師，在外面要多練習。

陳副局長感言：

感謝母校，感謝張創辦人建邦及所有教過我的淡江老師，對吳主任帶領西語系走向國際化的創新精神，深感敬佩，希望西語系繼續蓬勃發展，栽培更多的西語人才。

最後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編輯感言：

經由這次訪問陳副局長，讓我成長不少，想必各位看完也獲益良多吧！短短的訪問，包含多少人生哲學在內！副局長的目標堅定，勇往直前，是我們大家需要學習的。對於現在就讀研究所的我來說，聽到副局長在大學期間就如此充實自我，一畢業就立刻發揮所長，實在令人羨慕與欽佩。勉勵自己能在剩餘的求學期間能像陳副局長一樣方向明確，提升自我，為未來鋪好一條平穩道路！

駐瓜地馬拉孫大使之採訪稿

(採訪整理/碩二 周曼婷 攝影紀錄/碩二 潘姿穎)

2010/07/17

孫大使大成為淡江西班牙語文學系的校友，現擔任中華民國駐瓜地馬拉大使。透過此次外交青年大使活動，淡江西班牙語文學系碩士班的同學有幸至友邦瓜地馬拉，與當地青年學子和民眾進行文化交流。服務活動期間，深受孫大使及其駐外人員之協助和照顧。

提起在學生時代裡，對於淡江的印象，大使表示：「淡江是一個精緻的校園。圍繞在群山之中，面對觀音山，鄰近淡水河，是令人嚮往的地方，讀書的好場所。」

並說：「現在回想起來，進入西語系後，獲益良多。若從各種面相來看，念了西文後，出國至西班牙讀書，認識具有豐富文化與觀光發達的一個國家。在當地，因而結識現在的太太，也在西班牙成家。回國之後，便進入公家機關服務。在公務員的生涯裡，我的運氣算蠻好的。獲得長官的提拔與照顧，使我擔任重要職務。現在為駐瓜地馬拉的大使，之前也在很多國家服務過。所以我認為，念了西文以後，使我的生涯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關於從事外交工作的人員，應具備的特質，大使表示：「我總覺得，第一個需具備的是外交素養。所謂的外交素養，應具備基本的常識，良好的語言能力。並且除了IQ以外，還需有良好的EQ，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也呼籲淡江的學弟妹們，考慮加入外交的陣營。由於外交工作使人有種新奇的感覺，做好能獲得很大的成就感。」



對於友邦瓜地馬拉駐外期間的深刻印象，大使說：「我感受到這個國家人民的和善與勤奮。與台灣相比，瓜國的土地較為肥沃並且資源豐富。但唯一可惜的是，受氣候變遷之影響，使得天災頻傳。對貧困的百姓而言，是種無情的打擊，損失很多的生命與財產。所幸在這方面，他們有一個孿生兄弟，名為台灣。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很欣慰的是能夠代表台灣在這個地方，與孿生兄弟攜手合作，創造人民幸福美好的一天。」

談及外交青年大使的活動，大使表示：「雖然沒有多樣齊全的設備，但我認為它是種深層的活動。由於透過你們的來訪，與當地青年學子和民眾有實質上的交流，帶來我們國內貼近人民日常生活的一種深層文化。經由交流，他們開始懂得喝茶的藝術，台灣的小吃，毛筆寫出來的字是如何，畫出來的畫又是怎麼樣。最主要是透過活生生的介紹者，與你們的接觸後，他們了解到這就是台灣文化，原來台灣文化是這麼樣地精緻。所以我覺得，外交青年大使活動是非常良好促進台灣與各個國家交流的一種連結。」

最後，對於母校淡江六十周年校慶，大使給予祝福並表示：「時間好快！已經過了六十歲了。六十對一個人來說，是一個大壽。我想對淡江而言，這只是中間的一個過程而已。我期待淡江能過好多個六十歲的生日，讓淡江不是只是台灣企業最愛的一所大學，也能夠變成世界頂尖的大學，這是我的期望。」

華語教學 - 李靜枝老師訪問後記

碩一 黃意惠 Flavia

一個濕冷的雨天，我來到跟李靜枝老師約定的咖啡廳，第一次的閒聊中就強烈的感覺到老師平易近人，溫暖的笑容與清脆的嗓音讓我安心不少。老師的談吐非常清晰，印證了字正腔圓正是當華語老師的第一步。

老師談到，1993 年她從西班牙學成歸國，因為對語文的熱愛，便開始思考我們身為華人，能說中文，但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在過去學習外文的過程中，能清楚明白地分析英文或西文的語言結構，但對於中文的運用卻沒辦法掌握要點。於是老師在 2001 年決定投考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這對於一個要兼顧家庭與事業的人來說，又要把時間再分割出去研究另一個領域的學問，實在是不容易。但在家人的支持與諒解下，老師順利考上並在 2002 年的九月入學了。說到這裡，老師溢於言表地流露出對家人的感謝。



老師在當下就問了我一個詞的語法結構，但會唸會寫的我，卻什麼也說不出來。我在 2011 寒假師大華語師資的培訓過程中，想起了老師一番話便有更深一層體會，了解到不是會說中文就會教中文；不同的發音、語法及篇章結構，必有其教學技巧。但對於從小就深處中文環境的我們來說，中文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文法，說中文是自然而然的表達方式。老師在研究所入學後，就到各大學的華語中心觀摩華語課程的上課方式，老師發自內心的讚嘆：中文的發音實在好美！後來她也開始實習，在各大學教授華文。談到老師為什麼現在沒有繼續從事華語教學的工作，實在是因為現實層面的考量。一直以來除了學英文外，日文就是第二外語的首選。當年老師在接觸華語教學工作的時候，台灣華語教學的需求量不大，鐘點費相當的低。相對的，國外華語教學的老師非常缺乏，待遇自然也非常優厚，但要爭取到國外教學的資格卻很不容易。套一句師大某位老師說過的話：「在台灣教中文吃不飽，餓不死」。但華文熱的旋風一直到如今不斷的攀升，華語教學認證的考試搶破頭，就是因為看準廣大華人市場；不少歐美、甚至亞洲非華語國家，學生也開始學中文。

老師表示，開始真正教學後，才發現對於中華文化知道的太少。華語教學刺激了老師對中華文化涵養的學習動機，所以後來到故宮博物院上了文化課程，包括認識古文物、唐三彩、古字畫等等。語文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為對於學習西班牙語來說，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們在運用的時候只能用隔靴搔癢來形容這樣的窘境，但如果深入了解中文，對於我們的母語中文，在教學的時候就可以因材施教，依照學生的需要做調整，面對學生可說是遊刃有餘。雖然身兼數職很辛苦，卻覺得很開心。老師也曾經在國合會所舉辦的中南美洲海外志工中，擔任西文課程訓練的老師，這些志工可能擁有農、牧、漁業的專長，但他們卻完全不會說西語，就這樣帶著一股熱誠和才剛學不久的一口破西文到遙遠的國家去幫助那裡的人民。他們結束一到兩年的海外生活後，對於西班牙文更加的熱愛，也持續不斷的繼續學習。聽到老師對這些志工的讚賞，讓我對於西語的世界更加嚮往。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期望未來可以參加國合會所籌劃的中南美海外志工，去體驗不同的生活並學習獨立自主。由於這樣一個單純的想法，於是讀外語的我就報名了寒假師大的華語師資培班，也因此開啟了我另一扇新視野。我從來不覺得中文有趣，但現在卻可以細細玩味，在每個漢字的演變過程中體悟到中華文化的奇妙可畏。在這樣的培訓課程中，我漸漸了解，培訓的重點不在於語言能力，而在於老師本身的教學熱情，教學是有方法的，不是會說就會教，一定得沉浸於目標語環境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把外語學好。敢說、多聽等人人皆知，但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理論與實務的差距在我學習西班牙文的時候也深深體會到。我認為不論是哪一種領域的教學，老師就是班上的靈魂人物，老師要能引起發端，有良好的開場及導入才能創造一個良好的氣氛，並能集中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我想老師對於教學的熱情，一定使許多學生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抱持著興奮的態度。

在愉快訪談的尾聲，老師衷心的建議我們要找到自己的興趣與專業，語言只是一種輔助工具，每個人都有夢想，但實踐夢想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感謝老師不厭其煩的回答問題，並分享人生的經驗與感受，實在是讓人受益良多。

訪問馮竹美學姊

碩二 Viviana

馮學姊為民國 57 年入學系友，畢業後曾擔任助教一年，之後負笈西班牙，在西班牙語言學校教授中文多年，去年甫退休，曾擔任西班牙系友會會長，多年來屢屢赴 Pamplona 探視大三出國學生對後輩相當照顧。

問：請問學長/姊當年在淡江就讀過程中，何者影響您最深，有何影響？

答：黃輝達老師。老師努力苦學的精神，對教學的認真及熱忱。

問：在國外就讀時期，有遇到哪些困難，如何去面對呢？

答：雖然在學校學過多年的西語，初到此地聽力、口語表達仍覺吃力，挫折感很深。重要的是要有信心，不氣餒。向同學借筆記、勤查字典、上咖啡店交流、看電視都是很好的方法。



問：經過多年的西班牙語薰陶，對於日後工作是否能學以致用呢？

答：居住在西班牙，日常生活與工作都要用到。因曾學過西班牙文學、歷史、地理等科目，較易瞭解與接受，進而融入。

問：對於學弟妹們有何期許和寄望？

答：語言只是工具，仍需要某種專業知識，所以應該依自己的興趣或職場需求多學習一項專業。

匿名學長專訪

碩二 Viviana

受訪學長不願具名，故以匿名學長稱之。

問：請問學長/姊當年在淡江就讀過程中，何者影響您最深，有何影響？

答：大一時黃輝達教授之文法課，奠定日後學習西文之基礎。

大二時陳雅鴻及熊建成教授以西文講授之文法課使基礎更紮實。

大三時系方聘請時任外交部中南美司副司長藍智民老師教授翻譯習作，教材內容廣泛充實，並啟發對外交工作的嚮往與興趣，系裏偶而邀請在工商，教育及公職等各領域工作之學長返校與同學座談，指引同學未來擬自我發展之路。還有學校開了「未來學」課程也對我影響很深。

問：離開學校後最懷念的是什麼？原因為何？

答：當時學校每年舉辦之拳擊比賽，西語系每年都贏得冠軍。因本人曾代表系裏參賽，雖未得冠但系上同學在擂台下加油聲，至今難忘。

問：在國外就讀或工作時期，有遇到哪些困難，如何去面對呢？

答：我很幸運考進外交部派到西班牙語訓一年，因文法基礎扎實學習並無困難，只是缺乏練習。之後到拉丁美洲國家工作生活都很順利愉快，並未遇到很大困難。

問：經過多年的西班牙語薰陶，對於日後工作是否能學以致用呢？

答：21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的來臨，多一種外語能力可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尤其外交是辦洋務，所以洋文必須要好，多年的西班牙語薰陶確實對我日後之工作推展助益良多。惟語文的進步是無止盡，我還繼續研習。

問：結束學業生涯後，投入職場所面對的酸甜苦辣為何？

答：投入職場會遇到的酸甜苦辣很多，壓力更是無法避免。重要的不是壓力本身，而是要知道如何自我調適，紓解壓力。建議養成運動的習慣。

問：對於學弟妹們有何期許和寄望？

答：有很多很多期許，希望除語文外，要多選修其他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課程。廣泛涉獵及閱讀，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從活動中累積經驗，建立自信，才能確立自己應走到道路。求學時期若未能善加把握，踏出社會後須付出更多代價來彌補求學時的空白。

系友分享篇



葡萄牙共和國建國百年話滄桑

駐葡萄牙代表處 周 麟

72 年畢業，曾在碩士班兼課，果受學生好評。

葡萄牙是地理大發現時期首先向外探險的歐洲古國。早在哥倫布 1492 年發現新大陸的前數十年，葡國的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ipe Henrique，請見附圖 1）就在葡國南部 Sagres 地區設立航海學校，大力培養航海人才（今日葡海軍訓練艦即以該地為名）。結果，葡國首先到達北非摩洛哥北部的 Ceuta（現屬西班牙），1482 至 85 年 Diogo Cão 到達剛果、安哥拉及幾內亞等地，並將黑人帶到歐洲牟利，嗣後並成為最大的黑奴販子。葡國探險船隻一路向非洲南部前進，狄亞士（Bartolomeu Dias）於 1488 年經過現今南非的好望角到達印度洋後，葡人開始在印度洋上沿非洲東岸前進東方找尋香料。達伽馬（Vasco Da Gama，請見附圖 2）於 1498 年橫越印度洋到達印度的臥亞（Goa），成為第一位發現從歐洲經海上航道前往印度的航海家（實際上他是外交家）。葡萄牙航海家因此深受鼓舞，於是按原路朝東方前進。葡萄牙的雙桅帆船（請見附圖 3）在那個年代經常航行於麻六甲海峽及東南亞地區，並建立貿易點。16 世紀 30 年代（可能是 1538 年）葡航海家到了澳門，藉口向明朝皇帝呈奉的貢品在航行中被海水打溼，請求廣東地方當局同意他們上岸曝曬貢品，並趁機以賄賂當局等權謀手段，取得在當地設立商館之默許。



有關澳門地位的問題中葡雙方各有不同見解。中方認為明清兩朝起初僅允許葡人在澳門經商，後來也同意他們定居當地，但僅有使用權，並無所有權及處分權。葡方則認為當時中國政府為酬謝葡守軍逐退海盜，故已將該地贈與葡國。葡方若干歷史學者甚至指稱中國皇帝曾將「聖旨」刻在金牌上並交予葡方。基於該項「認知」，歷史上每次中葡為澳門地位問題舉行談判時，葡政府總是大費周章地在其國內翻箱倒櫃找那塊「金牌」，甚至還訓令其駐英、法及西班牙大使館去當地博物館找尋。其結果可想而知。

那時，葡航海家繼續向東前進，1543 年抵達日本長崎，也從事貿易。大約是在 1540 年代，葡國水手經過台灣並命其名為「福爾摩沙」（Ilha Formosa，意

為美麗之島)，也將澎湖命名為「漁人島」(Pescadores)。當東南亞盛產的香料、中國瓷器、絲織品及茶葉等稀奇產品運抵里斯本，再高價轉售歐洲他國時，里斯本立刻成為歐洲的貿易中心。葡文中「一本萬利的買賣」即稱“negócio da China”，可為佐證。

到達日本的葡國人不但進行貿易，也間接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我們台語的麵包發音為「胖」，事實上這個字葡文為 pão，乃十六世紀經由葡萄牙人傳到日本的；之後，日本於日據時代再轉傳到台灣。另外一個日本的食物天婦羅 (tempura) 也是葡人傳去的；當時葡人將鱈魚乾 (cod fish，葡文為 bacalhão) 泡軟去鹽剝碎後混合麵粉油炸而成。現在葡國許多餐館、咖啡或糕餅店還常見這道家常菜，現名為 patiniscas (請見附圖 4)。此外，日語的玻璃杯乃是葡語的 copo 傳入日本後被日本人借用；日語衣服上的釦子則是葡語的 botão。一位劍橋大學畢業的作者甚至在書中說日語的“arrigado”也是由葡語的 obrigado (謝謝) 演變而成。這點不知日本人是否能接受。另一個促進文化交流的字是中文的茶，成為葡語的 chá (西班牙語則為 té)。17 世紀一位葡國公主嫁給英王，她將飲茶的習慣帶去，於是下午茶演變成為上流社會的喜好。

葡萄牙航海家也在現今的印尼附近進行貿易活動，1512 年到了香料群島及帝汶島上的東帝汶 (East Timor)，一直到 1975 年才放棄。至於在印度的臥亞，葡國商人也從十六世紀起建立貿易點，後來葡王室更設立印度總督府，專責亞太地區日本、澳門、東帝汶及東南亞地區之貿易及海上擴張行動。二次大戰結束後，印度獲得獨立，於 1961 年揮兵攻入臥亞，結束了葡國在當地四百多年的統治。葡萄牙航海家另一個最重要的「發現」乃是巴西。1500 年 Pedro Álvares Cabral 從葡國出發，目的地為印度。他的船不同於其他多數的葡國船隻順利向南邊的非洲航行，而是被風吹向西邊。登陸上岸後，他發現當地盛產一種木材，土語音似 brasil，加工後可做口紅，因此他將該地命名為 Brasil，清朝時即譯為巴西。早在 1494 年葡國經由羅馬教宗的斡旋與西班牙簽訂 Tordesillas 條約，雙方同意由葡國前已發現的亞述群島 (Açores) 及維德角 (Cabo Verde) 連結之虛擬直線以西 370 里格 (leguas，總計約合 1850 公里) 處為中心點劃一南北基線，該線以西劃歸西班牙探險及殖民；以東則屬葡國之範圍。幸虧簽訂了那個條約，才使得葡國後來的發現及開拓巴西成為合理之舉。C 氏當即宣告該地屬於葡國，並建立殖民統治。有歷史學者懷疑葡國在簽此條約時可能早已知道有那塊土地的存在，而 Cabral 是否真的被風吹往該地，或根本就是「循線前往」的，仍是歷史上的大謎團。1521 年，當時為西班牙王室效力的葡人麥哲倫自西國出航，經南美洲最南端的海峽 (嗣以其名命之) 到達太平洋，抵達菲律賓，並以西王菲律賓之名取該群島為菲律賓。嗣麥氏雖在菲遭土人殺害，但其所乘船隻航返西班牙，完成第一個航行全球一周的壯舉。西國佔取菲律賓也曾與葡國發生權利誰屬之爭端。

十七世紀巴西發現黃金礦，帶給葡國王室巨大財富，也促使葡國經濟飛躍發展。但是，好景不可能永遠存在。1807年拿破崙進攻伊比利半島，擒獲西班牙國王，佔領當地並繼續揮兵葡萄牙。葡國王室經由英國協助派艦護送前往巴西避難，並改在里約日內盧統治其帝國。1810年，英國威靈頓公爵率領由英國及葡萄牙組成的聯軍擊潰法軍，葡國本土則反而受英國將領的軍事統治多年，引發不滿與反抗。1821年葡國王返回里斯本，行前群臣建議留下彼得（Pedro）王子坐鎮巴西。葡王返國後，葡國陷入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激烈政爭。遠在巴西的彼得王子在群臣的建議以及壓力下於次（1822）年宣告獨立，建立巴西帝國，葡萄牙三百多年的統治終告結束。巴西地大物博，天然資源非常豐富，因此吸引大量歐洲移民前往墾殖；19世紀末日本政府也經由計劃移民將眾多日本人送往移民開墾（巴西原屬意華工，惟因清廷反對未果），巴西國力蒸蒸日上。葡國方面則因喪失巴西而造成人民不滿，政爭更烈，國力於是持續走下坡；1832年發生內戰，烽火延燒至1834年，死傷枕藉。之後，政爭從未止息。1908年1月葡國王在政局激化下遭刺身亡。1910年10月5日共和派結合海軍發動政變，推翻葡王室，建立共和。今年適為葡締造共和第一百週年。

1911年至1926年期間葡政府更迭達44次。西方新聞界發明一個動詞“Portugalize”用於描述政治嚴重失控。1926年的軍事政變終結了第一共和，然次年波爾多（Porto）再度發生軍事叛變，直到1932年薩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出任總理，制新憲，廢國會，箝言論，建立所謂「新國家」（Estado Novo），政局才漸告穩定。然而，薩氏「反共又反民主」之獨裁政權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巴西在獨立近兩百年後的今天已經成為全世界第八大經濟體，人口近兩億。反觀其殖民母國卻變成南歐人口一千萬的小國，在經濟上排名全球第37名，真可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巴西獨立後葡國於是緊抓其所擁有的5個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維德角及聖多美普林西比，後來並透過修憲把這些殖民地納入為海外省，其人民全數被納為葡國人。1960年代起，當聯合國大力推動反殖民運動時，英法等殖民國家紛紛接受世界潮流，讓殖民地陸續獨立；英國並趁勢成立大英國協，唯獨葡國不然。當時民族主義浪潮席捲全球，再加上鄰近非洲國家獨立的示範作用，葡國的殖民地開始躍躍欲試。另外一方面，列強覬覦安哥拉蘊藏的豐富石油、黃金及鑽石，以及中國、蘇聯和古巴所謂革命輸出的戰略，安哥拉等國對抗葡國殖民戰爭終不可免。經過近十餘年的戰爭，葡萄牙徵調兵員之多，僅次於以色列，高居全球第2。葡年輕人死傷眾多，有門路的人競相移民甚至偷渡出國，國家生產力大降。

1974年4月25日葡國軍隊青壯軍人不滿政府繼續非洲戰爭之政策，以及因



返校帶來精采演講

不斷遭批評「作戰不利」心生怨懟，加以其長期未改善之待遇而發動政變，推翻政府，俗稱「康乃馨革命」。革命後，葡共產黨立即掌握政權，立刻宣布放棄其對前殖民地之統治，非洲葡語系 5 國獲得獨立；同時片面宣佈承認中共（中共未相對給予承認）

並與我國斷交。內政方面，採行將眾多企業收歸國有且不補償等激進手段，秉政至 1975 年 8 月才由社會黨（PS）及社民黨（PSD）共組較溫和之政府取代。一直到 1980 年代中期葡國一直處於政局不穩定之狀態，西方國家深恐葡國成為歐洲的古巴。1985 年大選期間偏右的 PSD 黨之 Cavaco Silva（為現任總統）勝選組閣，總統則由 PS 黨之 Mário Soares 擔任。經此 10 年，葡國民主運作方告穩定。

20 世紀中經歷君主制、軍事獨裁、法西斯政權及共產黨執政的葡國終於走出全民共同決定的道路。1986 年葡正式加入歐盟，成為西方民主陣營之一員。1998 年獲世博會主辦權，用以紀念達伽瑪發現印度航道 500 週年。自此葡萄牙終與西方接軌，重現國際舞台。

（全文刊於《外交部通訊》99 年 12 月號）

師生分享篇



ELOGIO DE LA LECTURA

(PARA ESTUDIANTES ABURRIDOS)

Profesor José Ramos

羅幕斯老師

En mis clases de español en Taiwan he observado un lastimoso “síntoma” que se repite, con poca sorpresa de mi parte, en muchos alumnos: el constante temor –y a veces pánico– al aburrimiento, ese estado de “hastío del alma” cuando no hay nada “interesante” o “divertido” que hacer. Es un temor que se cumple con implacable puntualidad. A esos alumnos que se aburren con tanta frecuencia suelo responderles con una frase que algunos toman como una broma (o simple ocurrencia): **pues yo nunca tengo tiempo para aburrirme**. ¿Y por qué digo esto? Porque me quedan –me esperan– muchos libros que deseo leer (tal vez necesitaría más de una vida para hacerlo). Y, ciertamente, decir algo así puede resultar una broma, o dar motivo a la burla, en la época que nos toca vivir, cuando se publican millones de libros en todo el mundo, como en ninguna otra época de la humanidad, pero por desgracia el índice de lectores es cada vez más bajo. Suelo decir que para mí la lectura no es una pesada obligación, sino más bien un placer, un goce inagotable, una diversión única, un medio incomparable para “navegar” por la imaginación (y no por Internet), para adentrarme en lo desconocido, y asimismo para conocer mejor el mundo que me rodea y, dicho de paso, conocerme mejor a mí mismo,

Entre los recuerdos más remotos y más gratos de mi infancia, y se me perdonará el impudor de ponerme como ejemplo, puedo mencionar ciertos libros que me causaron una impresión imborrable. Cuando tenía siete u ocho años, leí *La isla del tesoro*, de Stevenson, esa apasionante historia de un chico y de temibles piratas en busca del tesoro escondido del Capitán Flint; en torno a los diez, me asombraron los hechos sobrenaturales de Moisés, Noé, Sansón y otros desmesurados personajes del *Antiguo Testamento*, que leí no como un libro religioso, sino como un compendio de aventuras fantásticas; sobre los diez años, me envicié con las emocionantes novelas de ambientes exóticos de Emilio Salgari; a los doce, enfermo de amigdalitis, devoré *Miguel Strogoff*, de Julio Verne, que cautivó mi imaginación con las aventuras del heroico correo del Zar en las inmensas y heladas estepas de Siberia; y a los quince, un buen amigo, socio del Círculo de Lectores, me prestó *La metamorfosis*, de Franz Kafka, cuya inquietante imagen del pobre hombre que un día se despierta convertido en un repugnante insecto me produjo pesadillas.

Así, quisiera afirmar con toda tranquilidad que mi vida sería muy distinta si no hubiese leído esos y otros muchos libros (novelas, cuentos, poesías, obras de teatro, ensayos, pero también obras de filosofía, arte o historia), con los que he disfrutado tanto y con los que he aprendido tantas cosas. Esos libros forman parte inseparable de mi vida. El gran escritor peruano Mario Vargas Llosa ha dicho que las mejores cosas de la vida le han ocurrido leyendo, lo cual podría parecer una exageración, pero no lo es si entendemos que los libros –es decir, la literatura– representan la más profunda expresión de la vida, ya que se nutren de ella y la reflejan de un modo incomparable. Para mí no es posible comprender los libros al margen de la vida, por la simple razón de que el lenguaje es lo que dota de *sentido* al ser humano, lo que lo *sitúa* en su papel predominante en el mundo y lo *diferencia* de las bestias.

Los libros son nuestros amigos más fieles y duraderos: siempre están a nuestra completa disposición. Valga esta hermosa frase del filólogo español Gregorio Salvador: “En cualquier momento de la vida siempre hay un libro que nos puede ayudar, que nos puede consolar, que nos puede entretener, que nos puede señalar un camino”. Y son sobre todo las obras literarias la expresión máxima de una lengua, las que reflejan fielmente momentos históricos, mentalidades, costumbres, ideas, creencias de todo tipo, el fondo cultural y los usos lingüísticos de un país o una comunidad. ¿Qué nos queda hoy de la antigua Grecia, del poderoso Imperio Romano o del Imperio Español que dominó Europa hace quinientos años? Sí, claro, nos quedan grandes monumentos, admirables obras artísticas, ciertas formas de pensar y ciertas instituciones políticas, jurídicas y culturales, pero nos quedan sobre todo sus obras literarias: esos libros, como por ejemplo *La Ilíada* y *La Odisea*, grandiosos poemas épicos atribuidos a un poeta ciego llamado Homero que vivió en Grecia hace cerca de 3000 años, que están al alcance de cualquier persona, en cualquier lengua y en cualquier país. Si alguien desea conocer en profundidad cómo era la sociedad española de finales del siglo XVI y comienzos del XVII, cómo pensaba la gente de aquella época, cómo concebían el amor y qué idea tenían de la vida, cómo era la moda, o incluso qué comían, no hay nada mejor para conocer con propiedad toda aquella realidad que leer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obra de un tal Miguel de Cervantes, un libro repleto de sabiduría que es como un inagotable tratado de historia, sociología, filosofía, psicología, política, economía, derecho, religión, lengua, arte, amor; vamos, de casi todo.

El filósofo y escritor español Fernando Savater (lean su estupendo ensayo *La infancia recuperada*) tiene una columna en el diario *El País* titulada “Levántate y lee”. Bajo esta invocación, quisiera decirle a todo aquel que se acerque a estas líneas que hay incontables libros maravillosos esperándonos. No hay tiempo para aburrirse.

Formosa, 我愛你

Rachid Lamarti

巴塞隆納自治大學博士班學生

(2010年夏天曾來系上作短期研究)

Tenía veinte años, una edad trascendental, cuando viajé a Taiwán por primera vez. Meses antes de mi partida, Thomas, un ingeniero químico alemán que cortejaba denodadamente a mi profesora de chino, quiso prevenirme. Autorizado por los años que había vivido en Taichung, me advirtió de que el trazado de las calles taiwanesas ponía en aprietos (y hasta los pelos de punta) al caminante. No tuve reparos en interrumpir su narración para confesarle que yo prefería la asimetría y las irregularidades, que aborrecía lo apolíneo, y que mi animal favorito era (y sigue siendo) el ornitorrinco. Thomas frunció el ceño y meditó un instante. No podía entender que me gustasen las espirales, los laberintos y el vuelo enmarañado de los loros. Al fin, se echó a reír y me llamó Quijote. Inmediatamente supe que no había leído a Cervantes. Nos hicimos amigos. Yo lo consolaba cada vez que mi profesora le daba calabazas y él me lo agradecía contándome sus peripecias por el mundo. No tardé en descubrir que Thomas era un alemán atípico, saleroso y propenso a la fantasía y a la exageración. Hace un par de años se casó con una taiwanesa de Taipéi a la que, curiosamente, había conocido en Portlligat. Poco después de la boda, se mudaron a Seúl. A estas alturas ya debe de haber convencido a varios jóvenes coreanos de que las calles españolas ponen en aprietos (y hasta los pelos de punta) al caminante.

A Taiwán llegué con los *Poemas Agrestes* de Juan Ramón Jiménez bajo el brazo. Es poesía para leer a oscuras, con los ojos del gato o del búho. Yo era un joven de Badalona, estudiante de chino mandarín, imberbe y soñador, aquejado de espejismos y de fragilidad nerviosa. Mi conocimiento sobre Taiwán se reducía a su localización exacta en el sudeste asiático (gracias a una heredada pasión por los mapas), a Ang Lee (por *Manos que empujan*), a la escritora Sanmao (por Mafalda), y al marchamo *Hecho en Taiwán* estampado en las posaderas de un sinnfín de artículos importados (juguetes, linternas, imanes, astrolabios, relojes de arena, etcétera). De mi primer día en la isla recuerdo la electrizante certidumbre de estar pisando otro planeta, el eco de las últimas palabras de Roy Batty en mis oídos: *Yo he visto cosas que vosotros no creeríais: atacar naves en llamas más allá de Orión; he visto rayos C brillar en la oscuridad cerca de la puerta de Tannhäuser. Todos esos momentos se perderán en el tiempo, como lágrimas en la lluvia. Llovía a cántaros. Aquella lluvia se me figuró hiperbólica, fogosa, redoblante. El paraguas, inútil; sólo un chubasquero hasta los*

tobillos podría haberme mantenido (y no del todo) seco. Si Borges hubiese vivido en Taiwán, su poema *La lluvia* habría destilado otras imágenes. Cuando nací también llovía: estoy predestinado a ver llover.

En Taichung dormí un par de noches, antes de trasladarme a Tainán, donde me instalaría por un tiempo. Tainán fue mi primer amor en la isla. El primer amor nunca deja de latir ni de humedecer los labios. Dediqué aquellas primeras semanas a la exploración del sur: de Tainán a Kending, de Pingtung a Taitung. Dicen que el sur está lleno de duendes y misterios. En Kaohsiung, por ejemplo, descubrí una fabulosa raza de salamanquesas que repentizan al anochecer. Pronto comprendí la razón de que los portugueses llamaran Formosa a la isla: en ningún otro lugar he conocido tan de cerca la inspiración, las orquídeas, la plenitud del árbol. No se me ocurre un nombre más acertado que Formosa. En Taiwán las montañas saben rimar, como las calles azules de Chefchaouen.

De mi primer viaje a Taiwán guardo en la memoria una colección de anécdotas (supuse broma o mundo al revés que las muchachas paseasen a pleno sol bajo el paraguas), asombros (librerías con más lectores por el suelo que libros en las estanterías), canciones (de 齊秦, de 優客李林, de 張雨生, de 陳綺貞). En Taiwán desperté a un universo de sabores (豆花, 珍珠奶茶, 芒果霜淇淋, 雞排, 麻辣火鍋, 茶壺雞, 臭豆腐, 蚵仔煎) y a una variedad dialectal del chino mandarín encantadora.

Con veinte años, la más leve distracción lleva a enamorarse. Yo me enamoré de un archipiélago. Desde entonces vuelvo a Taiwán como quien regresa a los brazos de su amante. Me gustaría volver más a menudo, estar volviendo a todas horas. El regocijo de embarcar rumbo a las coordenadas geográficas 23 30 N, 121 00 E contrasta con el berrinche inocultable de tener que abandonarlas. No importa que el tráfico parezca espoleado por el rabo del mismísimo demonio o que el tamaño de las arañas supere con creces el nivel de tolerancia de un aracnofóbico moderado. La batahola de las cigarras en Fengshan, los grillos concertistas de los arrozales de Xiushui, el erhu del parque Zhongshan purifican el ánimo y transforman la fatiga en ensoñaciones. El erhu es un instrumento mágico: prodiga troncos que flotan en el agua. Ésa es su música, la de troncos flotantes en el agua, troncos de almendro o cinamomo.

He recorrido la isla casi palmo a palmo. El faro de Eluanbi sembró mis ojos de galaxias; Yeliu, de fantasmagorías geológicas; Yilan, de hortensias. En la montaña Ali me torcí un tobillo y escruté los fractales de los helechos en busca de metáforas.

Todas las noches de calor pienso (o me sueño) en Taroko con el agua por la cintura. Sostengo la respiración con las manos bajo el río. En ocasiones ese pensamiento (o ese sueño) se diluye en una alucinación de cantos rodados y tritones de incienso en cuyo centro el lago Riyue gira como un disco de jade.

Nunca en Taiwán me he sabido perdido. No sé si atribuirlo a mi propio nombre (al fin y al cabo, *nomen est omen*, según Plauto), a mi pitagórica fascinación por las cárceles imaginarias de Piranesi o a la prodigiosa virtud de las frutas de la isla. Tampoco me he sentido extraño: en Taiwán, el verso de Wang Wei 獨在異鄉為異客 me resultó por primera vez ajeno. Taiwán me devolvió el gusto por curiosear, el placer de husmear detrás de las cortinas. Me maravilló que en un territorio tan pequeño (poco más de treinta y dos mil kilómetros cuadrados) se hablasen tres lenguas sónicas (mandarín, taiwanés y hakka) y más de una decena de lenguas austronesias (las lenguas formosanas). Así nació mi interés por la dialectología y por la antropología lingüística. Hoy ese interés persiste y lo cultivo. No niego que desarrollé también ciertas adicciones: el karaoke, los baños termales, los tallarines con ternera, el té verde helado, el trato con los taiwaneses, la ornitología, contar las ranas de los templos.

Una noche, a orillas del Danshui, cerca del Fuerte de Santo Domingo, con la luna debatiéndose en el agua, compuse esta nana como declaración de amor a Taiwán y a los taiwaneses:

Sólo deseo que hablemos, bajito.
En secreto, a oscuras, acurrucaditos.
En un cuarto alejado de rincones umbríos,
hablemos bajito.
O mejor, no hablemos,
así, calladitos.
Hablemos callados.
Callados diremos el amor que sentimos.
Oiremos callados el amor que dijimos.
Callemos bajito,
no despertemos el sueño con tanto sonido.
Silencio.
Ya los duendes se han ido,
lejos,
a la orilla del río.

給我種子，我就給果實——安赫拉，費葛拉

林盛彬老師

以往西方人慣常掛在嘴上的「女士優先」，似乎表明了他們對女性的尊重，其實不然。就以西班牙來說，也要到一九三一年第二共和時期所頒佈的新憲法才賦予婦女參政的投票權。從教育的層面來看，從一九〇〇年全國僅有十位女大學生，發展到一九三〇年終於突破四千名，這過程可說相當不容易。在此情況下，女權問題在內戰後被重新提出，尤其是在批評的社會現實主義潮流中竄起，並不令人驚訝。如一首詩所表白的：

我就是泥做的女人，泥做的女人：
但愛讓我滋生了一個庇護所。

詩人們稱我為香水、花朵
多麼草率，多麼輕薄！

花朵？不，我在開花。我毫不改變地散發香味。
他們給我種子：我就給他們果實。
水在我身上流洩：但我不是水。
岸邊的樹林，我溫柔地
接待它們並將它們映在水中：但我不是樹。
飛揚的鳥？不，是安全的窩巢。

適宜的河床，熱情的道路
為了讓物種永恆流動。

——〈泥做的女人〉

這樣的聲音和當前的女性主義訴求相比，顯然是小家碧玉型的宣示。但在那個獨裁封閉的年代，「給我種子：我就給果實」這已經達到駭人聽聞的尺度了。這個在威權時代覺醒的女詩人就是安赫拉·費葛拉(Angela Figuera)。她於一九〇二年出生在北部畢爾包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雖然有來自家庭與社會的壓力，反對她唸大學，但她最終還是從馬德里大學文哲學院畢業，一九三二年獲得文學教授的教職，並於同年結婚。內戰時，他丈夫參加了共和軍，就在戰況激烈的首都保衛戰中，費葛拉產下一個兒子，首都淪陷後，又隨軍南下瓦倫西亞。內戰結束後，她的教職、工作與應有的福利全被剝奪。

雖然她很早就寫詩，但詩人自稱，那些都是屬於現代主義的模仿作品。事實上，戰亂流離，也很少保留下來。待到時局稍稍平靜，她帶著孩子往北到了索利

亞，在那裡得以重回平靜的生活，開始實踐她年輕時的夢想。這時期她開始展現自己的風格，並於一九四八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泥做的女人》。此時，她已是享有聲名的詩人，在戰後的西班牙詩壇，與歐迭羅、謝拉雅形成一個巴斯克鐵三角。次年，又出版了《純粹的索利亞》。她的詩以女性主義的議題為主，但這兩本詩集仍較屬於個人的內在傾訴。由於書中的「情色」傾向，她也嚐到了被當局查禁的困擾。一九五〇年的《被天使征服》則開始批判社會的貧窮、痛苦、饑餓與不公。隨後的作品《無用的吶喊》(1952)、《生命的除夕》(1953)、《艱苦的日子》(1953)、《冷酷的美》(1958)、《我觸動土地》(1962)等，都集中在對社會問題、人的根本立場之反思，或對形上、存在問題的思考。

.....

我要高高興興地穿過人群
而不會因為
一鋤一鋤翻土的人們
一掌一掌消耗時間的人們
一滴一滴注滿水井的人們
的眼光而害怕。

因為肯定的是那會讓我羞愧，
會讓我停止心跳和微笑
當我注視著
那麼多把害怕扛在肩上人，
那麼多擔負饑餓的人，
那麼多額頭被血液裡隱藏的憤怒灼傷皮膚
的臉和衣裳。

.....

——〈冷酷的美〉

《冷酷的美》是最為人所知的詩集，在包括言論自由、人權方面，藉著詩公開對佛朗哥的專制政權提出批判，結果自然是被查禁。但費葛拉並未讓步，她將全稿分寄給幾個住在墨西哥的朋友，最後並在墨西哥出版，並獲得由「流亡知識份子聯盟」頒發的「新西班牙詩歌獎」。此舉顯然觸怒了獨裁政權，所以，當《我觸動土地》一出版，隨即遭受到許多惡意的批評攻擊，這一連串的「騷擾」，卻讓她萌生退出文壇的念頭。最後，她轉向童詩的世界，並出版了《給聰明孩子的笨故事》(1980)和《給所有孩子的歌》(1984)。她於一九八四年在馬德里逝世。她的時代刻意封鎖她的聲音，但歷史終將還給她一個無限寬廣的舞台。

《愛情是狗娘》電影中「狗」的象徵意涵

碩二 周曼婷 698120127



圖片出處: http://nitrogliserin.net/wp-content/gallery/movies/amores_perros.jpg

一、前言

無論是在歐美亦或是亞洲的電影中，狗的象徵意義多以忠誠為主，並且不乏其例，如 2004 年於台灣上映的日本電影《再見了，可魯》，2006 年上映的英國電影《靈犬萊西》等。「狗」在普遍觀眾的認知裡，是一種具有人性的動物，與人類共患難的朋友。然而，在這部由墨西哥導演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 (Alejandro Gonzalez Iñárrit) 所執導的電影《愛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 中，導演賦予「狗」此一形象，除了忠誠的象徵外，還傳遞出其他的思維。以下，筆者將藉由電影分析，進而試圖詮釋此部片中「狗」的象徵意涵。

二、劇情結構分析

此部研究的電影，依其劇情結構可分為三段故事，並由一場車禍串連整體。三條故事線軸，看似平行般的各自發展，實則時而交會著。由車禍事件成為共同

主要的交會點，並成為三段故事裡，各個主角往後故事發展的導向。

第一個故事講述著一位年輕人 Octavio 愛上嫂嫂 Susana 的不倫愛情。為了帶離懷有身孕的嫂嫂遠走高飛，利用哥哥的狗，開始以鬥犬方式賺取金錢。在逃跑的車戰追逐中，撞上 Valeria 的車子。車禍導致 Octavio 行走不便，以及 Susana 先前棄守兩人的約定，而感到絕望。第二個故事描述一位美麗的模特兒 Valeria 與有婦之夫 Daniel 的外遇愛情。前途光明的星路，一場車禍而使腿部受傷。並使兩人間的關係發生轉變，爭吵取代原先的甜蜜。此外，因愛犬受困於地板下之事件，進而導致 Valeria 最後必須經由手術切除一條腿。第三段故事的主角為一位流浪漢殺手 El Chivo。年輕時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離開了家人，投身游擊隊。對女兒 Maru 的思念，只能遠遠的注視與關心。在車禍事件裡，拿走 Octavio 身上經由鬥犬所賺來的錢，並將 Octavio 受傷的鬥犬帶回家治療，進而導致鬥犬咬死家中所有長年相伴的狗兒們。

經由上述的劇情分析，可觀察到三段故事與車禍事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此一重要事件進而深入討論，三位主角在這場車禍中則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Octavio 為車禍的肇事者，導致這場車禍發生的主因。Valeria 為車禍中的受害者，被突如其來 Octavio 所駕駛的車子而撞上。El Chivo 為車禍發生現場企圖救援的人，但看見 Octavio 口袋中的錢，便起了貪婪之心，拿走錢與 Octavio 受傷的狗逃離現場。

車禍事件使 Octavio 與 Valeria 兩人下半身腿部受傷，造成日後 Octavio 行走不便，以及 Valeria 因疏於照料，必須切除一條腿。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兩人受傷的共同點為腿部，而腿部的受傷使兩人產生莫大的影響。對 Octavio 而言，年輕的身體正處於最佳的狀況，應是自由隨意跑跳的腿，卻因車禍而造成行走不便。與之同時，呼應著他最後獨自落寞的處境，並與先前奔放狂熱的愛情形成了強烈的對比。Valeria 為一位模特兒，正處於花樣年華的年紀。腿對於模特兒而言，應是展示女人線條與性感的工具，卻因腿部的受傷失去了工作機會與自我。Valeria 看著海報中當時的自己，與事件發生後的現況形成了對比。

三、「狗」的象徵

無論是片中的劇情，亦或是電影的原文標題《Amores Perros》，我們可以發現「狗」是此部電影中，相當重要的元素之一。若以電影符號學的概念來說，「狗」則是一個符號。而符號對所指涉的所指物(referent)並不關心，重要的是符號意義乃是人為生產的、或文化內涵的。¹那麼「狗」此一符號在該片裡被賦予何種意義呢？

Ramiro 的狗 Cofi，原是家中飼養的家犬，後來變成 Octavio 賺錢的工具，以實現與 Susana 遠走高飛的想法。Cofi 隨主人參加鬥犬比賽，成為一隻鬥犬，在比賽中為求生存必須將對手至於死地。另一方面，主角 Octavio，年少血氣方剛如同鬥犬般的性格，為了擁有嫂嫂 Susana，不惜唆使他人圍毆自己的親哥哥。在情感與慾望的驅使下，年少輕狂的天真想法與作為，使得人如同狗般，好鬥的暴戾之氣，最終使自己受傷。在此段故事中，「狗」成為主角性格上的一個反射。

第二段故事當中，Valeria 的狗擁有亮麗的長毛，並深得她的寵愛。狗與主人兩者之間，共同擁有相同亮麗的毛髮。狗是主人的寵物，而主人 Valeria 則是 Daniel 的情婦，如同是男人的寵物。另外，狗因意外而受困於黑暗的地板下，與車禍意外受傷的 Valeria，互相呼應，呈現 Valeria 受身體痛楚與心理上自我的創傷。在 Daniel 的幫助下，狗順利脫困。反觀 Valeria，對 Daniel 情感產生質疑，最後因錯失治療的機會，必須切除一條腿。Valeria 的心靈並未如同狗的脫困，而得到解脫。在這段故事中，「狗」的際遇與主角互相呼應，但最後卻是比主角幸運。

El Chivo 將跟隨他的流浪犬視為家人。流浪犬為人類所遺棄的狗，正如他被社會放逐邊緣的處境一樣。在車禍現場中，救回受傷的鬥犬 Cofi。康復後的 Cofi 卻將家中其他的流浪犬咬死，使 El Chivo 頓時從 Cofi 的身上，看見自己過往的影子。曾為利益而殺害其他人，為理想而傷害自己的家人，最後只剩自己一人。在第三段故事裡，「狗」呈現主角過往的自己，主角因而決定做些改變。

¹參閱《影視裡論與批評》，第 33 頁。

「狗」在此部片裡，代表著主角性格上、人生現況以及過往自己的反射，應此我們可以推論，該符號「狗」成為三位主角們的縮影，代表著「人」，亦或是說「人」同時也代表著「狗」。我們將該符號「狗」，依照皮爾斯(C. S. Peirce)的符號學分類原則，將其歸類為第三類「象徵類」(symbolic)²。由於在普遍觀眾的認知裡，即所謂的約定成俗，該符號「狗」具有忠誠的象徵。

在此部片裡，忠誠的象徵表現在「人」忠於自己的愛情或是理想上，就像狗對主人的忠心不二。從 Octavio 的愛情觀，便可得到解釋。即便 Susana 透露出將以 Ramiro 的名字為肚中小孩命名，其意味著她愛的人依舊是 Ramiro，但 Octavio 對 Susana 愛卻絲毫不減。在 Ramiro 死後，Octavio 仍抱有希望，再度向 Susana 提出遠走高飛的想法。Octavio 對自己情感的忠誠，如同狗對自己主人的忠心。

而 Valeria 的愛情，在 Daniel 對婚姻關係不忠誠的情況下建立。Valeria 在媒體面前安排假情人，Daniel 放棄妻子與小孩，只為了兩人能一起生活。彼此對這段感情的執著，未嘗不是一種對自己愛情理念的忠誠。

另一方面，El Chivo 年輕時對政治理想的抱負，拋棄家庭只為實現自己理念的執著，與狗兒對主人忠心不變的堅持，不謀而合。

此外，片中以「狗」做為「人」的一個寫照，與「狗」被視為具有人性的動物有些許的關聯。也因此，藉由此一動物之形象與片中主角的性格和處境做其聯結。然而，反觀主角的性格特質，我們可以發現「人」具有「狗」的暴戾之氣，一種原始的野性存在於人的身上。正如榮格 (Carl Gustav Jung) 對人格結構提出「陰影」(The shadow)的概念，其為一種非識的原型，乃是人類在進化的歷程中，最早的動物性，特別是動物性之最基本的部分。³也就是說，人的本性深處存在著動物性，只是在我們並沒有察覺到。

無論在面對愛情或理想時，導演亞利桑德羅對主角們自身的慾望與執著上的

² 符號與其所指示的事物之間，無任何經驗或邏輯上的聯繫，但是，按照社會約定俗成的使用習慣，形成一種表意關係。

³ 參閱《人格心理學概要》，第 68 頁。

刻畫，似乎顯現出「人」與「狗」兩者間，其實沒有多大的區別。

梅茲 (Christian Metz) 認為，每一個導演都會以他特定的電影論述方式來結構他的故事世界，就像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語言習慣或談吐方式一樣。⁴導演運用「狗」與「人」兩個不同的元素，營造出此片另一番的意境。兩者元素相互牽引，「狗」象徵著人對情感或理想的忠誠，而「人」的本性則潛藏著與狗相同的那份原始野性。

四、結論

在導演的安排下，「狗」成為主角們的縮影與寫照，以及象徵著人們對愛情或理想等事物上某種程度的忠誠與執著。表面上，「狗」被運用成為主角的投射，實則反映出「人」存在著與狗一樣的特性。最後，狗與人之間的分別似乎不是那麼的重要了。

五、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Jacques Aumont & Michel Marie 《當代電影分析方法論》，吳珮慈譯，台北：遠流，1996。

劉立行，《影視理論與批評》，台北：五南，2005。

賈馥茗，《人格心理學概要》，台北：三民，2005。

⁴ 參閱《影視理論與批評》，第 33 頁。

「喝過 Chagre 河水的人，會再回到這個國家。」—巴拿馬諺語。

巴拿馬，對筆者來說只是個曾經在地理課本上出現的名詞，有著一條世界船運經濟要道，跟西語系學生最有關連的也只有剛好也是個西語系國家，而筆者在這塊土地學習語言，學習當地文化，認識過去幾百年曾經是歐洲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在現今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從一個台灣學生的眼中，由筆者的角度與體驗，認識這個國家。

帶著對拉丁美洲的印象與些許興奮來到巴拿馬，但，看到的卻是與期待相反的景象，這個國家太進步了，巴拿馬市有全拉丁美洲最大的 Shopping mall 及現代化的高樓，讓希望落空的筆者反而有些不習慣與不適應，但仍努力去發現去認識這個國家的文化及生活。

巴拿馬生活

巴拿馬上班時間是朝七晚三或晚四，一般大多七點半開始上班，比較晚一點的到八點，會這麼清楚是因為我住的地方旁邊就是工地，工人們大約七點半開工敲敲打打直到下午四點。

學校第一節課是早上七點半，從小學到大學都一樣。一開始聽到這個時刻表非常吃驚，想巴大學生要幾點起床阿？因為巴大裡沒有可以睡到敲鐘前十分鐘的宿舍，學生們以通勤為主，以筆者同學 Alex 為例，他是在職專班的學生，住在距離市中心四十分車程的地方，據他表示，他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六點出門趕七點半的上班時間，一定要這麼早出門是因為市中心會塞車。

塞車，是巴拿馬的一個特色。巴拿馬市有大約一百萬人居住，車輛約五十萬輛，可想而知上班時間馬路上會有多少車輛同時出門。巴拿馬有紅綠燈的路口很

少，所以當地人開車時非常的自由，不用看燈號，若遇到阻礙便拼命的按喇叭；喇叭聲不是只按兩聲警告一下對方，而是長按兩三秒；不管是前車開太慢還是堵車甚至是前方煞車也要按喇叭警示對方，總而言之，巴拿馬人開車只要遇到不順心就按喇叭以發洩情緒，不管時間地點，所以會在凌晨一兩點還聽到喇叭聲。

另外，巴拿馬的郵政系統不全，也沒有郵筒，要寄信就一定得去郵局，但不是所有郵局都收件，要看信件大小，有些郵局只收信件類而不收包裹類，所以要寄包裹得坐計程車到另外一區的大郵局寄信。沒有郵筒就不需要郵差，那該怎麼收信呢？在巴拿馬得租郵政信箱，所以這裡有個發達的行業就是信差，專門幫客戶到郵局領信或是替客戶送信到其他地方，在辦公大樓前常見到信差們的摩托車排排站。

巴拿馬的房子沒有地址，雖然現已經過規劃有路名，但居民很少用甚至不用，所以當跟其他人說租屋地址變成為一件麻煩的事，曾經問過房東先生正確的地址，他說是「Via Argentina, Calle 3 B Norte a lado de la panadería Petit Paris, casa de muro de piedra.」。所以 Petit Paris 麵包店對房東先生來說很重要，那是一個大地標，不過後來麵包店搬走了，房東的地址也從原本的「麵包店隔壁」變成「公園到愛因斯坦雕像頭方向中間那條小路上左邊第一家石頭牆的房子。」

計程車，是筆者在巴拿馬出外的好朋友。巴拿馬的計程車不像台灣以跳表計費，這裡是司機喊價而且以區計價，在同一區內價錢大約是美金一塊二五，跨區加價二十五分，大約是一塊五美金左右，但有時候會遇到因為我們是外國人所以亂喊價的壞司機，筆者曾遇過原本車資只要一塊二五卻收兩塊美金的司機。這裡的計程車為共乘制，司機會在路上繼續攬客或是招車時車上已有其他乘客，但由於這裡搶劫事件不斷，故共乘制有一定的風險，因為之後共乘乘客可能是司機的同夥等等，例如上一屆的替代役男就在搭計程車時被洗劫一空，所以雖然車資便宜但有一定的乘車風險。

除計程車外，一般大眾運輸工具就是公車，在這裡公車名為「Diablo Rojo」一紅魔鬼，公車車體是美國淘汰的舊校車，司機會將車體重新彩繪，賦予老車新

的風貌。由於巴拿馬公車沒有載客人數限制，所以一台公車上可以塞滿六十人以上沒有問題，也因為沒有公車站牌，所以每台公車會有類似車掌的人在車頭報路線給等車民眾及幫司機收車費，車資很低廉，只要美金二十五分，約台幣九塊。

閱讀，連巴拿馬人都承認他們不愛看書，其原因可能包括巴拿馬買書很貴，一本暢銷書加上稅金要價二十五塊美金左右，一般民眾不會特別花錢買書，正因如此巴拿馬的書店很少也很難買書，舉例說明，有一次筆者去號稱全巴拿馬最大的書店找賽萬提斯的作品，結果在諾大的書店裡，只有兩本賽萬提斯的書，一本是他的自傳而另一本當然就是唐吉訶德，其它的作品一本也沒有，不禁讓人感嘆在巴拿馬買書真難。

巴拿馬人不太買書除了書價較高之外，另一原因是薪資不高，一般人月薪約四百美金左右或更少，薪水共分兩次發放，分別是每個月的十五號及三十號，在發薪水的這兩天可在銀行前看到大排長龍等著兌換支票的景象，餐廳用餐人數明顯變多及超市商場出現採購人潮，不誇張，人數真的差很多。

巴拿馬市為拉丁美洲最現代化的都市，但也由於巴拿馬貧富差距大，因此市中心高級住宅區旁緊鄰的便是貧民區；在這夜景有如美國曼哈頓區美麗的城市，高樓影子下的則是由鐵皮屋頂及水泥牆所搭建的房舍，讓人心酸的景象。

在巴拿馬除了學習西班牙文之外，還獲得許多難得的經驗。今年(2009)正值巴拿馬總統大選，所以七月份總統就職大典，馬總統率使節團來訪問友邦。專案期間，筆者在駐巴拿馬大使館新聞參事處所設立的新聞中心當工讀生，第一次看到這種大場面，許多政府高層、新聞記者，也看到大使館的參事、秘書們為了專案從幾個星期前開始忙得焦頭爛額，從車隊司機到新聞中心會場布置，從飯店房號到僑宴座位表，所有的事都從頭規劃，一刻不得閒。此外，筆者在新聞中心值班期間還很幸運的跟巴拿馬新總統馬丁內利合照。

巴拿馬現在對筆者而言不只是課本上的一個地名，而是一個曾待過同時也是人生中二十三歲的回憶。很感激西語系將這個學習的機會給了筆者，讓自身所學的西班牙文不再只是課本上的知識、字典裡的單字，成為真正的體驗，實際的運用。雖然一開始有所不適應，但現在，卻對這個國家依依不捨，時間太短，還有好多地方沒有去過，還有好多當地文化不認識，我期待有朝一日再踏上這片土地，好讓我再度填滿地圖上的空缺。

真心付出的交流，熱切參與的回應

碩二 潘姿穎 Regina

民國 99 年，是個讓我回憶久久的一年…… 因為這一年，我很幸運地和朋友們參與，由吳寬老師率領「國際青年大使—瓜地馬拉團」出發到另一個不同風情的西語世界。

歷經了將近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我站在台灣友邦——瓜地馬拉的土地上。在飛機降落途中，看見了層巒疊嶂的山，那是親眼所感受到的第一印象——瓜國是個被群山擁抱的國家。這次的文化交流活動，我接觸到不同年齡層的瓜國朋友，親身所接觸到的是——純真、樸實、可愛又熱情。

首站是「中華民國女子小學校 Escuela Nacional de Niñas "República de China"」，小女孩們熱情的迎接與精彩的開幕式，特別的是，在友邦，看到一群外國人跳著舞龍、武術，唱著西文版的國歌，讓我驚奇又開心地淡忘了接下來首堂「台



灣文化」交流課程的緊張。「中華民國」四字對於這群小女生而言，是有那麼一點點地熟悉，卻又大大的陌生，熟悉的是這和小學同名，又曾接觸到一點台灣的文化，如舞龍、武術；陌生的是，她們對於中華民國亦或台灣，只有模糊的概念。下午，「男子中學 Villa de Los Niños」，學生們、修女們熱烈歡迎我們一行人，每段表演節目都是那麼別出心裁，讓人印象深刻，當然在這裡，第一堂「台灣文化」當然還是由我先發，雖說早上已經有一次課程經驗了，但緊張還是周旋在我的腦海。介紹「台灣文化」課程中，我發現到外國學生與台灣學生的大不同，他們勇於去認識一切新知，對於各種事物都充滿好奇並且樂於接納。台下的每一位都在疾筆振書，連老師們也不例外，這點，讓我感動不已。

對於台灣各種文化，他們覺得好玩又新奇。台灣與瓜國也有飲食文化的相同點，如水果有荔枝、鳳梨、香蕉；美食方面：「紅豆」台灣吃甜的，瓜國卻吃鹹

的；「臭豆腐」這道菜，令他們笑開懷；「十二生肖」，所以虎年出生的小孩都是老虎囉！?「馬洛京大學 La Universidad Francisco Marroquín」、「Paíz 基金會」以及「安地瓜 El sitio 文化中心」也有交流課程，包含了「中國結」、「茶道」、「書法」、「國畫」、「紙扇」、「童玩」、「美食」、「武術」等課程，讓我又再次感動的是有小至六、七歲的孩童到高齡至七、八十歲的長者，都興致盎然的參與我們這次的活動：對於中國繩的打法，不厭其煩地一直練習到打出一條漂亮手鍊或是胸針，小朋友則有創意不斷的作品；對於台灣茶，讚不絕口的品嚐；對於書法，一邊練習書寫一邊詢問定義，記下每個字；對於童玩，不論大人、小孩都有豐富的創意和色彩搭配；對於「美食」，第一次參與湯圓製作與品嚐，並且樂於接受台灣口味；對於武術，男學生們認真的練習，在成果驗收時，每一位都自告奮勇的要上台表演，讓我是又驚又喜。下課時，不論是在哪個地點的參與者，都興致不減地詢問台灣的各種文化，不論是流行、食物、中文等等，這也讓我一直滿溢著快樂與感動，因為所用心付出的交流，有他們熱切的回應。

這次的交流活動，雖然在瓜國停留的只有短短兩周的日子，但迄今，那段歲月還是深烙在我心中，出發前是忐忑不安的心情，活動中是融入在文化交流的喜悅，回來則是留下滿滿的美好記憶與成果。回台後，有次和瓜國朋友聊天時，她對我說：『Oye, sabes cuando veo los taiwaneses y recuerdo a tí.』，在電腦前的我，內心感動不已，我想，瓜地馬拉與台灣，雖然兩國地理位置相距甚遠，時差也差距十四小時之久，但在那裡，我遇到了純樸、熱情的瓜地馬拉、認識了善良、熱情的瓜國朋友。兩國不同的文化交流下，語言不會是隔閡，共通點是真心，因為這樣讓我們的距離又更近。

尼加拉瓜見聞

碩二 伍怡潔 Mónica

在到尼加拉瓜之前，我們每位團員對於尼加拉瓜這個國家都充滿著好奇心，因為大家聽到尼加拉瓜就會想到瀑布，但其實尼加拉瓜根本沒有什麼大瀑布，不過火山倒是很多。我們一行人就這樣從台灣坐了好久的飛機終於到了尼加拉瓜。

初到尼加拉瓜對於眼前的環境有點不適應，因為沒有高樓大廈，只有矮矮的平房，跟台灣真的非常的不一樣，但是尼國人有著跟台灣人一樣的熱情，所以我們沒幾天就適應了當地生活。

兩個禮拜的行程中，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傳遞台灣的文化給尼國的年輕人。藉由一些簡單的中文教學、歌曲教唱、美食分享、功夫及台灣的景色，讓距離我們非常遙遠的尼國學生得以了解台灣。

在教授台灣文化時，雖然經過長達半年的準備，加上無數多次的彩排，但在上課的第一天依然還是出現了狀況，例如：音響設備的不足，電腦的設備的問題，但因為之前都有先預想到，因此在短短的時間就解決。第一堂課是中文教學，由於尼加拉瓜的學生對於中文完全沒有概念，因此在開始上課的時候，就抓住了學生的注意力，一開始從中文字教起，因為中文字的由來非常特別，我們即從象形文字開始教起，大家對此都非常感興趣，因為對他們而言這實在非常特別。接著從最簡單的打招呼開始，如：你好，早安，午安，晚安，謝謝，不客氣以及再見，大家很快速學會簡易的打招呼，也能倆倆上台對話，接著教授句子，例如：你好嗎？很好，你呢？而大家最感興趣的則是 Te quiero 我愛你，Yo tambien 我也是，因為拉丁美洲是個熱情的國家，因此，也是講的最的一句話。

之後則是中文課中，大家最愛的姓名教學，由於我們中文的名字是由父親的姓或母親的姓，加上一到兩個字的名字組成的，但西方的姓名，通常會有父母親的姓加上名字組成的，因此時常會看到長長的一大串，而為了把中文姓名文化教授尼加拉瓜的學生，我們讓每位學生寫上自己的西文名字，之後隊員將每位學生的名字翻譯成中文，並加上羅馬拼音，讓尼國學生能夠輕鬆的念出自己的姓名，此外，我們也解釋了我們名字中代表的意思，因為中華文化中每個字都有自己屬於的意思，而尼國學生對此非常感興趣。

我們每位團員在某次電視直播節目中，向尼國的民眾介紹我們中文名字的涵意，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有位團員叫『石偉真』，她在節目中將她自己的名字解釋為 la piedra muy grande，結果走在尼國路上還有尼國民眾跑來問她說：「妳

是那位 la piedra muy grande 嗎？」讓我們深深覺得，尼國人民真的非常的熱情，也讓我們每位團員覺得我們真的有做到了文化交流的部分。

這趟行程雖然非常的辛苦，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辛苦之後有著美好的回憶。我們也非常的感謝有這種難得的機會，讓我們能夠實地的到邦交國，而不在只是從影片或者是書本上看到。兩個禮拜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是兩個禮拜的回憶將會一直烙在我們的心中。

Ministros de Finanzas de Américas divergen sobre impacto de los flujos de capital

美洲各國金融部長對於資金流動的影響意見分歧/各持不同意見



Por Por Jordi Zamora | AFP – dom, 27 mar 2011 12:28 p.m. EDT

Ministros y responsables de Finanzas de América debatieron este sábado cómo enfrentar el impacto de los flujos de capital extranjero a la región, sin llegar a una posición común.

美洲各國金融部長暨負責人週六就如何因應外國資金流入該區產生的影響進行討論，但並未達成共識。

Reunidos al margen de la asamblea anual del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BID), los 31 asistentes a la reunión acordaron estudiar medidas para potenciar el comercio y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tras una discusión tildada de "positiva" por el ministro de Finanzas canadiense, Jim Flaherty, en rueda de prensa.

美洲開發銀行年會中，三十一位與會者在討論之後，同意研究發展貿易與區域整合的措施。之後在記者會中，加拿大金融部長法拉賀提(Jim Flaherty)認為該討論具正面意義。

"Hubo un franco intercambio de puntos de vista sobre la situación económica y los desafíos actuales, que incluyen el precio de los alimentos, de las materias primas y de los crecientes y potencialmente volátiles flujos de capital", explicó Flaherty, que presidió el encuentro.

該會議主席法拉賀提說明，在會議中，與會者對於當前的經濟狀況和挑戰，包括糧食、原料和日益增加且快速流動的資金價格，直接提出各自的觀點。

"Hay diferentes puntos de vista, esa fue la naturaleza de la discusión", explicó el ministro al ser preguntado sobre la ausencia de una postura común.

他被問及會中缺乏共識的情況時，表示：「在此討論中所討論的主題有不同的觀點是很正常的現象。」

"Creo que lo que aprendimos fue exactamente eso, que no hay una medida que sirva para todos los casos", añadió el ministro colombiano Juan Carlos Echeverry, cuyo país albergará el año que viene la quinta reunión ministerial.

明年將主辦第五次部長會議的哥倫比亞之金融部長艾奇維理(Juan Carlos Echeverry)補充說明：「我認為我們學到的就是，沒有任何的措施能夠因應所有的情況。」

América Latina recibió el año pasado unos 220.000 millones de dólares en capital privado, según cálculos del Instituto Financiero Internacional (IIF), que representa a la banca internacional.

據代表國際銀行的國際金融協會估計，去年約有 2,200 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流入拉丁美洲。

El éxito de la región a la hora de superar la crisis financiera de hace casi tres años ha sido elogiada por instituciones como 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FMI) y por inversores internacionales, ansiosos de buscar mejores rendimientos ante el pobre desempeño de los países más avanzados.

該區因成功克服歷時三年的金融危機而備受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與國際投資者的讚揚，他們渴望在表現不佳的較先進國家尋求更大收益。

Pero eso ha generado un creciente recalentamiento de las economías de la región. La inflación se ha disparado, las monedas se han apreciado en numerosos países.

但這卻造成拉丁美洲經濟過熱日趨嚴重、通貨膨脹率激升與許多國家的貨幣升值。

El real brasileño se ha apreciado casi un 40% en los últimos dos años respecto al dólar.

近兩年巴西黑奧兌美元匯率已升值約 40%。

Los flujos de capital hacia los países emergentes y la apreciación de las monedas es uno de los puntos de discusión más candentes en el seno del G20 (Grupo de países avanzados y emergentes).

資金流向新興國家與貨幣升值，為 G20 (20 個先進與新興國家)內部最迫切的議題之一。

"Nuestra expectativa no era alcanzar ningún acuerdo. Este no es un foro destinado a tomar decisiones. Es un foro importante para discutir, para compartir, planear", justificó Flaherty.

法拉賀提(Jim Flaherty)解釋：「我們並不期望達到任何協議。這不是一個決策的論壇(討論會)，而是一個討論、分享與計畫的重要論壇。」

El ministro argentino de Finanzas, Amado Boudou, había explicado poco antes a la prensa su satisfacción por la diferencia de criterios durante la reunión.

阿根廷金融部長博多(Amado Boudou)不久前向記者說明他很樂見於會議中有不同的意見。

"Para nosotros es edificante ver cómo los organismos multilaterales plantean que los países necesitan salidas distintas" a los desafíos internacionales, explicó Boudou, en referencia a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FMI).

博多(Amado Boudou)提到國際貨幣基金時，他解釋：「對我們來說，能看到多邊組織認知各國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案因應國際挑戰，有其啟發性的意義。」

El director gerente del Fondo, Dominique Strauss-Kahn, asistió a la reunión, junto al director general del Banco Mundial, Sri Mulyani, y el presidente del BID, Luis Alberto Moreno.

國際貨幣基金總經理史特勞斯康(Dominique Strauss-Kahn)協同世界銀行總經理穆里安妮(Sri Mulyani)與美洲開發銀行總裁莫瑞諾(Luis Alberto Moreno)參加本會議。

Strauss-Kahn sugirió a los países dejar que se aprecien sus monedas, según un resumen de su intervención publicado en un blog por el Fondo.

根據史特勞斯康(Dominique Strauss-Kahn)發表在國際貨幣基金部落格上的一篇文章的摘要，他建議拉美各國放手讓貨幣升值。

"En algunos casos, los controles de capital podrían ser útiles, pero no deberían reemplazar los ajustes fundamentales de las políticas", añadió el responsable del FMI, según su blog.

史特勞斯康(Dominique Strauss-Kahn)在他的部落格尚提到：「在某些情況下，資本管制可能是有用的，但不應取代政策的基本調整。」

La región debe aprovechar su bonanza para emprender reformas estructurales, como una mayor recaudación fiscal y orientar sus inversiones a una mayor calidad en programas educativos o en infraestructura, sugirió Mulyani.

穆里安妮(Sri Mulyani)建議，拉丁美洲應把握繁榮時期來進行結構改革，例如增加稅收及引導投資者大量投資於教育方案或基礎建設品質的提升。

El presidente del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Luis Alberto Moreno, quien encabezará desde el 25 de marzo la asamblea del organismo en Calgary, Canadá. Los ministros de economía de la región discutirán allí el alza del precio del crudo y los peligros de un recalentamiento económico en América Latina.

美洲開發銀行總裁莫瑞諾(Luis Alberto Moreno)將於3月25日起主持在加拿大卡加利的會議。拉美各國經濟部長將於此會議中討論拉丁美洲原油價格上漲及經濟過熱危機之課題。

來源：

<http://es-us.noticias.yahoo.com/ministros-finanzas-americas-divergen-impacto-flujo-capital-20110326-182754-432.html>

No hay fronteras para el amor

Adela 詹瑋伶

Hoy día hay más de ciento noventa países en el mundo y más de seis mil millones de personas. Aunque son diferentes en cuanto al color de la piel, la lengua, la cultura y la religión, todos comparten una misma cosa: su corazón de amor.

Ma Jie era un sacerdote canadiense que vino a Taiwán para ayudar. El día 9 de marzo en 1872 llegó a Tamsui. En aquella época Taiwán estaba retrasado, por eso encontró muchos obstáculos. Pero gracias a sus creencias religiosas y a su infinita paciencia, finalmente superó todas las dificultades. Además, puso especial atención en la educación y la medicina, por eso fundó una escuela y un hospital. Ma Jie murió ya hace muchos años, pero su legado continúa influyendo en los taiwaneses.

Hace poco ocurrió un catastrófico maremoto en el sur del Asia, que causó muchas pérdidas materiales y de vidas humanas. Cuando la noticia fue transmitida por televisión a todos los rincones del mundo, hubo un montón de organizaciones que donaron agua, alimentos, ropa, etc., a aquellas regiones miserables para evitar que las víctimas tuvieran frío o murieran de hambre. Al mismo tiempo, muchos países participaron en los trabajos de salvación y enviaron a Taiwán sus equipos de cuidado médico para tratar a los heridos. En aquel momento, todas las barreras entre países habían desaparecido y cada persona hacía un gran esfuerzo para ayudar a los demás.

En definitiva, el amor puede contribuir a reparar los desastres y a elevar la calidad de vida de un país. Con el tiempo el amor no se esfuma nunca, al contrario, su fuerza es cada vez mayor en todo el mundo.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Alicia 張嘉文

Recuerdo que mi primer día en Tamkang estaba muy alegre, llena de ilusiones sobre mi vida universitaria. Si mal no me acuerdo, me levanté muy pronto, pero no era por el inevitable nerviosismo o la infranqueable ansiedad, sino por la larga distancia entre la universidad y mi casa.

En efecto, Tamkang estaba a una hora y media de mi casa, tenía clase a las ocho de la mañana, con lo que salí de mi hogar a las seis y media. Entré en el metro con prisa y enseguida éste empezó el recorrido. El paisaje pasaba, los edificios modernos poco a poco se convertían en casitas bajas y luego apareció ante mis ojos el manglar y el río tamsui. Todo era como una pintura hasta que tomé el autobús lleno de estudiantes.

Cuando llegué al campus me asombré mucho. En toda mi vida había visto tantos estudiantes de una vez. Además, había un montón de chicos. Como en mi bachillerato sólo se veía chicas, me resultaba extraño que los chicos aparecieran por mi nueva escuela. De vez en cuando, tenía este monólogo en el corazón: “¿Por qué están aquí? ¿Son de aquí?”. Aunque suena ridículo, me ocurría de verdad. Entonces sentí que todo el mundo sabía que yo era de primer curso, de lo más ingenua, torpe y bruta. De hecho, era así sin duda. En aquellos días temía perderme, no podía entrar en la biblioteca con soltura, ni andar por el campus sola... Me pasaban muchas cosas inesperadas.

Con todo, todo merecía la pena para acostumbrarme a la vida nueva. La universidad me ofrecía clases interesantes. Y era la primera vez que podía apuntarme a las asignaturas que realmente me interesaban, lo cual apreciaba profundamente. ¡Qué gratos recuerdos!

La solidaridad como muestra de amor

Celia 許佳燕

Me parece que hay muchas clases de amor, como la relación entre los amigos, los amantes, los parientes... En nuestra vida, podemos encontrar un montón de ejemplos que nos muestran que “no hay barreras para el amor”. Como , por ejemplo, cuando un nativo se casa con un extranjero. Los dos tienen nacionalidad diferente. Se conocen en un lugar por casualidad, entonces se enamoran y deciden pasar la vida juntos.

Pero hay otro tipo de amor que se llama “solidaridad”. Los niños de África, por ejemplo, sufren el hambre y la enfermedad, y carecen también de oportunidades para estudiar. Sin embargo, pueden ir al colegio por medio de nuestras donaciones mensuales. Además, los médicos taiwaneses van a curarlos gratis para que mantengan la salud.

En este momento especial, experimentamos intensamente que el amor existe en el mundo. A causa del gran terremoto de septiembre en 1999, en Taiwán hubo muchos muertos y heridos. Los equipos de socorro de otros países vinieron para ayudarnos en las tareas de rescate en los edificios destruidos. Además, los miembros de la fundación Tzu Chi fueron muy solidarios: ellos cocinaron para las víctimas que no tenían hogar ni familia y cuidaron de los niños que tenían miedo.

En conclusión, debemos ayudar a los demás aunque no sepamos su nombre ni su aspecto, con el fin de transmitirles nuestro cariño y solidaridad sin fronteras.

Problemas actuales de la sociedad taiwanesa

Emilia 梁雁屏

Para mejorar la calidad de vida de los taiwaneses, primero, creo que tenemos que proteger el medio ambiente. En los últimos años, Taiwán ha progresado mucho en el orden internacional, pero con la modernización han aparecido muchos tipos de contaminación que destruyen el ambiente natural. El nivel de vida está bajando y esto causa muchos problemas a la sociedad.

Me parece que cada persona tiene responsabilidad en el cuidado del medio ambiente. Podemos hacer algunas cosas simples en la vida para mejorar el medio ambiente, por ejemplo: no tirar basura, clasificarla. Mientras tanto, el gobierno tiene que ejercer una estricta vigilancia sobre el medio ambiente, publicar sus políticas ambientales y castigar a la gente que viole las leyes.

La sociedad tiene otro problema serio: el porcentaje del desempleo. A causa del alto porcentaje de paro, muchos taiwaneses no tienen oportunidad de trabajar y mantenerse. Si quieren mejorar su calidad de vida, tendrán que tener un trabajo fijo y dinero suficiente. Por eso, es urgente mejorar el ambiente del trabajo.

Además, es necesario mejorar la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 para que los taiwaneses tengan la potencia, la competitividad y los conocimientos necesarios. Empecemos desde lo básico para elevar la calidad de vida en Taiwán.

¿Cómo mejorarías la calidad de vida de los taiwaneses?

Viviana 徐珮嘉

7 de noviembre de 2005

Me parece que la calidad de vida de los taiwaneses es un poco mala. Los europeos ponen mucha atención en el tiempo libre y el ambiente residencial, por eso tienen una calidad de vida alta, pero ¿cómo conseguir en Taiwán una calidad de vida como la de los europeos?

Creo que los taiwaneses trabajan demasiado, casi todos los días trabajan y la jornada laboral es demasiado larga. En consecuencia, no tienen tiempo suficiente y desatienden su tiempo libre después del trabajo: este es el problema principal. Me parece que tienen que trabajar menos y aprovechar mejor el tiempo para relajarse con actividades como ver exposiciones, visitar museos, etc. Esto podría ayudarles a relajarse y lograr la satisfacción de su alma.

Por lo demás, hay otro punto importante para mejorar la calidad de vida: tener una residencia cómoda. Excepto durante las horas de trabajo, el resto del tiempo los taiwaneses casi siempre se quedan en casa. Tener un hogar cómodo permite poder relajarse totalmente y liberar el alma.

En definitiva, mejorar la calidad de vida de los taiwaneses no es tarea fácil, pero algunos taiwaneses ya empiezan a notar la importancia de la calidad de vida y van mejorándola gradualmente. Espero que pronto podamos tener una calidad de vida como la de los europeos.

El verano pasado, fui a España por dos meses. El primer mes, estuvimos en Cuenca, que está en Castilla la Mancha, un campo pequeño. La gente aquí es optimista y simpática. Especialmente los alumnos de la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Nos ayudaron muchísimo. La parte más famosa de Cuenca son las casas colgadas. Es muy precioso. La vida en Cuenca era tranquila pero divertida. Desde la residencia hasta la escuela solo se tarda cinco minutos andando. La clase empezaba a las nueve y media. Así no necesitábamos levantarnos muy pronto. El primer día de clase, muchos periodistas vinieron para entrevistarnos. Nuestras fotos aparecieron en el periódico y la tele al día siguiente. ¡Somos famosos! Es verdad que somos famosos porque la gente en Cuenca nunca ha visto tantos Taiwaneses. Después de la clase, la escuela nos organizaba muchas actividades, por ejemplo, íbamos a la piscina, al centro y al museo, dabamos una vuelta por Cuenca, y visitábamos las casas colgadas. Los fines de semana, viajábamos muchos lugares, probamos muchos platos típicos de España. No todos eran ricos, pero nos gustan. El clima en Cuenca era suave pero hacía calor. Pasamos muy bien en Cuenca no queríamos ir a Salamanca.

En agosto tuvimos que ir a Salamanca, que está en Castilla y León. Es una ciudad grande. Salamanca en verano, siempre está llena la gente de varios países, es que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es muy popular para los extranjeros. Encontrábamos mucha gente de Alemania, Francia, Japón, Korea, etc. Estaba muy bien porque podíamos practicar español con los extranjeros. Desde la residencia de Oviedo hasta la escuela se tarda "viente" minutos andando. Tuvimos que levantarnos a las siete y media cada mañana. La clase empezaba a las nueve. La vida en Salamanca siempre estaba ocupada. Para no estar aburrida, participé en muchas actividades, iba a la clase de cocina, las exposiciones gratis, los viajes con otros alumnos. No estuve mucho tiempo en España por eso cada día tuve que hacer algunas cosas. Viajamos a Andalucía, muchos alumnos de Wenzao pensaban este viaje fue un desastre, pero para mí era muy interesante. Me encanta la vida en el sur. Hacía mucho calor, pero el color de las casas en el sur es blanco. Era muy impresionante para mí. Fuimos a La Alhambra, la cultura árabe era colorida y rica. También la gente es amable y agradable. Quería quedarme en Andalucí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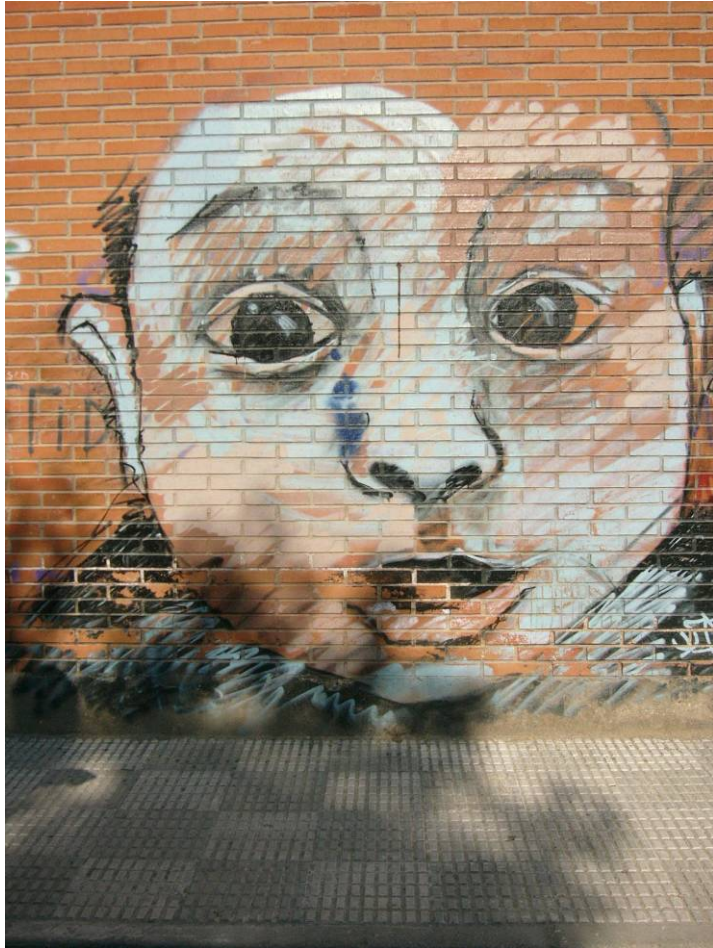
Durante los dos meses, encontré algunas cosas muy diferente en España, por el ejemplo :

1. Los españoles se besan en la cara dos veces cuando se conocen por primera vez.

2. España tiene motos, y hay muchas motos.
3. La gente en España fuma muchísimo.
4. Las tiendas de España tienen "la siesta", cierran casi dos horas por la tarde.
5. Los españoles no hablan mucho inglés.
6. Los españoles a veces no quieren compartir la mesa con alguien, como en Taiwán podemos compartir la mesa aunque no nos conocemos en el restaurante.
7. Los españoles comen las dos y cenan a las nueve. Los taiwaneses, vamos a morir si comemos tan tarde. ¡Tenemos hambre!
8. El sol aparece a las siete y desaparece a las nueve. ¡Cuánto tiempo!
9. La mayoría de los jóvenes que tienen casi 30 años, aún viven con los padres. La casa son muy muy caras en España.
10. No se necesita decir tanto "Gracias" a los españoles. Los españoles piensan que los asiáticos siempre dicen "Gracias" sin parar.
11. El tiempo es muy distinto por la noche y por la mañana en España. Hay que cambiarse muchas veces al día.

Aunque solo nos quedamos por dos meses, aprendo muchas cosas sobre la cultura de diferentes países y el estilo de vida en España. Es una pena porque me faltan muchos lugares en España por donde quiero viajar. Se lo recomiendo a los hermanos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tienen que ir a España. España siempre les dará la bienvenida.

街頭藝術



去年暑假，我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西班牙留學團，兩個月的庶民藝術，說明了生活在的時間，我們在西班牙一共玩了十一個地方，讓我擁有了一個充實、美妙的夏天。在西班牙，我發現了一個很棒的東西，這是一般旅遊書上沒有介紹到的，就是——西班牙的街頭塗鴉，精采的畫面不輸給教堂的壁畫，這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文化素養。

他有一個西文名字，叫做 **graffitis**。漫步在街頭上，令人驚艷的街頭壁面畫作，常吸引住我們的目光，讓我們不由自主的駐足欣賞，沉醉在美麗狂放的線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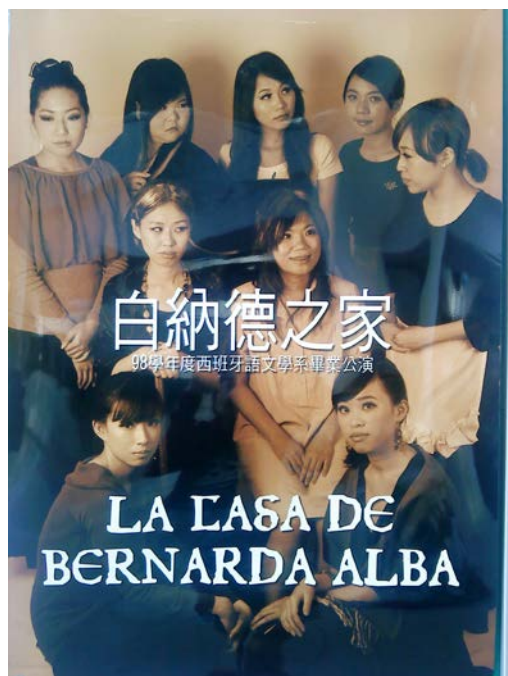
中，陷入無限的想像空間裡。這就是為什麼我會特別點出這個特色景點的原因。在台灣也有街頭塗鴉。我們常在圍牆、地下道的牆壁上看到某些人的「傑作」——「你需要工人嗎？」、「無聊請 CALL 我」的無聊字句，歪七扭八的字體完全沒有美感，反而破壞了整潔的環境。但是在西班牙，這些牆壁卻是一位位不知名的「畢卡索」盡情揮灑的畫布。

雖然說，有些畫面內容非常大膽甚至不是很文雅，但是每一個作品，都是獨一無二別具一格的。每當我們經過地下道或是建築物時，看到這些精心創作的作品，就像進入了一個室外美術館，深受感動鼓舞，連我這個不怎麼會畫畫的人，都想拿起畫筆大展身手。牆壁上的塗鴉有身材苗條的美女、雄壯威武的大力士、西班牙的政治人物、有趣搞笑的卡通人物、邪惡的虎克船長，這些圖案栩栩如生，彷彿就要從牆壁走出來了一樣。最令我感到好奇的是：這些人都是什麼時間出來畫畫的？怎麼完成的？一連串的問題浮在心頭。我好想有機會親眼看到他們完成作

品。還有一個很不可思議的地方，他們所用的顏料，不是我們美術課上所使用的蠟筆、水彩、彩色筆，他們是用噴漆來完成每一個圖案及文字。利用噴漆居然也有辦法作出漸層的色彩，真的是太神奇了。西班牙朋友告訴我們說，這是一種西班牙特有的藝術，政府也沒有刻意去管制，所以才可以讓他們有如此多的創造力。

這樣的街頭藝術饗宴，讓我在旅途中，又多了一道新發現，希望在台灣也可以有這麼多采多姿的作品，呈現在我們生活周遭，讓藝術在身旁生根發展。預約下次的西班牙之旅，我一定要拍下更多這些街頭上美麗的邂逅。

照片：畢業公演



2010
Federico García Lorca 創作
《La Casa de Bernarda Alba》



2010 年演講

日期	演講者	演講題目
98 下		
99/03/09	林燦輝(國貿局執行秘書)	駐外經驗談
99/06/09	邱稔壤(政大外交系系主任)	拉丁美洲政經情勢-兼論生涯規劃
99/04/12	張冠超(中央社顧問)	Word Power
99/03/19	游標榮(傑出系友)	品牌策略
99/03/31	龍本善 Luis Roncero(台大外文系講師)	El humor español: ¿por qué y de qué nos reímos?
99/05/04	黃耀生	國貿實務與西班牙語
99/03/11	Jaime Viñals	Desde Guatemala a las cumbres del mundo
99/03/17	精靈幻舞舞團團長賀連華	佛朗明哥舞表演
99 上		
99/09/17	政大歐洲語文學程古孟玄專任助理教授	翻譯理論概說 1
99/09/24	政大歐洲語文學程古孟玄專任助理教授	翻譯理論概說 2
99/10/27	黃耀生	國際貿易實務與西班牙語
99/11/01	黃礦春	全球化趨勢下的西班牙語文
99/11/05	黃瀧元	我的外交經驗
99/11/10	龍本善	論文內容架構與順序：以西班牙語與中文為例
99/11/29	何萬儀	申請國科會經驗分享工作坊
99/12/03	沈起元	西班牙統一性
99/12/28	周麟	我與伊比利半島之因緣

募款成果

99 學年度

黃任佑	捐款西語系獎學金	拾伍萬元
閻艾琳	捐款	玖仟元
戚慧明	捐款	參仟元
林劍虹	捐款	伍仟元
朱一萍	捐款	參仟元
姜瑚潔	捐款	參仟元
黃礦春	捐款	參仟元
李大中	捐款	參仟元
黃輝達	捐款	伍仟元
吳寬老師	捐款	陸仟元
黃耀生老師	捐款	參仟元
吳寬老師	捐款	陸仟元
吳寬老師	捐款	陸仟元
馮竹美	捐款『馮之洵獎學金』	肆萬元
石雅如老師	捐款『吳啟南獎學金』	陸仟元
林禹貞	捐款『吳啟南獎學金』	陸仟元
詮星翻譯有限公司	捐款	參仟元

60週年校慶贊助系上活動捐款

游琚詠	捐款	壹萬元
黃瀧元	捐款	參仟貳佰元
陳雅鴻老師	捐款	壹仟元
林惠瑛老師	捐款	參仟元
林盛彬老師	捐款	壹仟元
張茂椿老師	捐款	壹仟元
陳小雀老師	捐款	壹仟元

黃耀生老師	捐款	參仟元
羅慕斯老師	捐款	壹仟元
戴毓芬老師	捐款	壹仟元
何萬儀老師	捐款	壹仟元
王秀琦老師	捐款	壹仟元
吳寬老師	捐款	參仟元
白方濟老師	捐款	壹仟元
白士清老師	捐款	壹仟元
林禹洪 老師	捐款	壹仟元
劉愛玲老師	捐款	壹仟元
張立卉老師	捐款	壹仟元
張文馨 老師	捐款	壹仟元
上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捐款	陸仟元

感謝以上贊助人

Olé 第三期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2011 年 4 月出版

聯絡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電話：02-2621-5656 轉 2336(碩士班), 2337(大學部)

電子信箱：spanish@mail.tku.edu.tw

責任編輯：碩一 Anita 蕭玕琦

封面設計：碩一 Margarita 張薰芃

指導老師：吳寬 教授